

《血屠：信阳事件认罪书集》

本博将陆续发出：《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系列之十七，共计 60 万字。

血 屠 信阳事件认罪书集 余习广 主编 内容简介： 信阳事件是上个世纪大跃进、大饥荒中最典型的惨案！ 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中，为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证明“工、农业生产实现更大跃进”，而大炼钢铁中工业体系已近崩溃，全党“工作重心”就集中于农业和粮食。时值秋收，在中央、省、地、县委部署下，信阳地区各县实行“四边”、“三光”征购政策，粮食征购“边收割、边打场、边征购、边入库”，仍未能完成征购任务。于是，信阳地区各级干部以极其残酷的暴力手段，发动起旨在“挖出更多粮食”的“反瞒产”运动： 为挖出“瞒产粮”，完成国家征购数字，地委、行署领导亲自挂帅，县委、县长率工作队上阵，公社、大队、小队干部率民兵武装和积极分子充当打手，围村搜粮、挨家挨户抄家、批斗、毒打、吊捆、活埋、灌尿、戴“狗头”游乡、锄头砸脑、剁手指头、脸上刻字、铁铤铲颈、油烧柴焚、锅烙、设“剥人厅、落魂厅”、穿糖葫芦（用削尖的木棒从人的屁眼捅进去）、活埋、点天灯、放起花（在妇女阴部插上震天雷，点燃爆炸后血肉飞溅）、五马分尸…… 与此同时，信阳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饥饿、吃野菜中毒、浮肿、小儿疳积、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紫绀、“非正常死亡”、人吃人……这是一场赤裸裸的血腥大屠杀！ 从 1959 年庐山会议后“反瞒产”运动，到 1960 年 4 月“整风”运动，6 个月内，700 多万人的信阳地区，饿死、因恶致病死 107 万，逼粮直接打死 8 万人！ 本书主编经过 26 年调查、收集、整理，汇集了所能收集到的信阳事件当年省、地、县、社机关和地、县、社、队当事实负责人向上级写出的检查书和认罪书 58 篇，并在附录中收集了在“反右倾”运动中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 3 篇检查书，以记录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 从这些屠夫笔写下的自供书中，读者将看到： 在这场“反瞒产”运动中，各级领导干部是如何赤膊上阵，亲手制造了这场血腥大屠杀的整个历史过程和详情。 （扉页题词）这是一场“天子一怒，伏尸百万”的政治运动， 这是一场“坚持党性”、灭绝人性的暴力“反瞒产”， 这是一场酷刑遍地、血肉横飞的“粮食争夺战”， 这是一场“户户挂孝、千村毁灭”的惊世大饥荒， 这是一场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 “信阳事件”责任者、原省、地、县、公社、大队党政领导机构和干部亲笔写下的检查和认罪书，交待了 700 多万人口的信阳地区，从 1959 年 9 月～1960 年 3 月，6 个月“更大跃进”运动中，暴力“反瞒产”，为逼出粮食“上交国库”，“饿死 105 万，打死、逼死 8 万人”、因饥荒致病 500 多万人、“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的全过程！ （感谢猫眼看人 3 位猫友的帮助，因未征求他们的意见，故不便写明其网名，在此，谨向 3 位猫友表示诚挚的谢意！若这 3 位看到本帖，可留言表示是否可以列名于本帖）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4:21

血 屠：信阳事件认罪书集

目 录

序言 余习广

中共河南省委、信阳地委、专署

1、《关于信阳地区发生浮肿和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1960 年 4 月 6 日) 中共河南省委

附：《关于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1960 年 4 月 4 日) 中共信阳地委

2、《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

(1960 年 12 月 4 日) 中共信阳地委

3、《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1962 年 5 月 26 日) 原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

附：(1)《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

(1962 年 7 月 10 日) 中共信阳地委

(2)、《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3)豫法刑一字第 15 号》

(1963 年 9 月 13 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4、《我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检讨》

(1963 年 1 月 5 日) 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信阳地区行署专员 王达夫

附：《王达夫的罪恶材料》

中共信阳地委

5、《对 1959 年到 1960 年错误的检查交待》

(1962 年 6 月 29 日) 原信阳地区行署付专员 潘幼耕

6、《我所犯的错误》

(1962 年 1 月 16 日) 原信阳地区行署财委办公室付主任 李英

附 1:《关于李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3 年 2 月 3 日) 中共信阳地委直属党委

附 2:《对“处分决定”的几点意见》

(1963 年 3 月 21 日) 李英

商城县

7、《关于商城县委所犯错误的主要经过和后果》

(1960 年 11 月 4 日) 中共商城县委

8、《关于对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

(1960 年 8 月 26 日) 中共商城县委

9、《关于对余集公社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

(1960 年 5 月 6 日) 中共商城县委

10、《关于去冬今春发生浮肿死人问题的检讨》

(1960 年 8 月 14 日) 原中共商城第一县委书记 王汉卿

附(1):《对王汉卿同志错误事实整理》

鸡公山会议办公室材料组

附(2)《王汉卿所犯错误事实材料》

(1960 年 8 月 28 日) 中共商城县委

11、《我的罪恶交代》

(1962 年 3 月 29) 原中共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 张念仲

11、《我的错误交待》

(1960 年 6 月 25 日) 原中共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兼砦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孙广生

附:《孙广生的罪恶材料》

(1960 年 12 月 5 日)

中共信阳地委办公室

12、《自我检查》

(1962 年 4 月 5 日)

原中共商城县何店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杨功时

13、《个人补充检查》

(1962 年 4 月 23 日)

杨功时

14、《我所犯罪恶和错误事实的检查》

(1962 年 1 月 9 日)

原中共商城县委监委付书记、组织部长 阮坐

附：《对阮坐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2 年 1 月 6 日)

中共商城县委

15、《自我检查》

(1962 年 1 月 6 日)

原商城县委副书记 何善普

16、《自我检查》

(1962 年 1 月 7 日)

原商城 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王志刚

17、《我在五九年冬六 0 年春所犯错误的检讨》

(1962 年 9 月 29 日) 原商城 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县检察院检察长 焦希明

18、《自我系充(统)检查》

(1962 年 1 月 22 日)

原商城县公安局局长 王昆明

附：《对王昆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商城县委

19、《1959 年冬 1960 年春的错误检讨》

(1962 年 4 月 13 日)

原中共商城县委办公室主任陈道发

20、《我在信阳事件所犯的错误事实》(

原商城县长竹园公社第一书记 刘海清

附：《关于刘海清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2年3月13日）

中共商城县委

21、《自我检讨》

（1962年4月13日）

原商城县委农工部副部长曾厚仁

22、《自我检查》

（1961年12月24日）

原中共商城县隆古公社党委书记 马益寿

23、《自我检查》

（1962年3月22日）

原中共商城钟铺公社书记冯万群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 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大陆直连本站: <http://tiny.cc/meyarw>)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4:28

感谢冰雪连君为本书所作出的大量文字整理工作!

光山县

24、《关于发生浮肿病和其它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1960年4月30日）

中共光山县委

25、《错误检讨》

（1962年5月30日） 原中共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孙铺公社党委书记 吴良保

26、《自我检查》

（1962年5月25日） 原中共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胡德仕

27、《交代》

(1962 年 5 月 8 日)

徐德宝

附 1:《对徐德宝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2 年 7 月 13 日)

中共光山县委

附 2:《县委对我处分决定材料上说明》

(1962 年 11 月 3 号)

徐德保

附 3:《关于徐德宝同志县委处理决定见面后提出意见的说明》

(1962 年 11 月 18 日)

中共光山县委组织部处理办公室

28、《所犯错误罪恶的检查》

(1962 年 7 月 11 日)

原中共光山县南向店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李宏书

附:《请求县常委对我所犯错误从宽再从宽的处理》

(1962 年 11 月 7 日)

李宏书

29、《自我交待》

(1961 年 3 月 28 日)

原中共光山县孙铺公社党委书记 黄立元

30、《对黄立元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2 年 3 月 26 日)

中共光山县委

附:《关于改变黄立元同志处分的请示》

(1962 年 7 月 18 日)

中共光山县委

信阳县

31、《我的检查》

(1962 年 4 月 16 日)

原中共信阳县委第一书记 徐国樑

32、《关于人口盲目外流的检查报告》

(1959 年 9 月 11 日)

中共邢集公社党委会

罗山县

36、《关于外流人口情况的检查报告》

(1960年8月24日)

中共罗山县委

37、《许文波同志代表县委常委关于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检查》

38《罪恶交代》

(1962年1月8日)

原中共罗山县委第一书记 许文波

附1：《对阶级异己分子许文波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2年4月23日)

中共罗山县委

附2：《关于同意对罗山县委“对阶级异己分子许文法的处分决定”给省委的报告》

(1962年5月12日)

中共信阳地委

附3：《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63年9月24日)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39、《我的罪恶全面检查》

(1961年5月5日)

原中共罗山县委办公室主任 万家印

附：《万家印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2年7月2*日)

中共罗山县委

40、《我的自我检查》

(1962年5月15日)

原中共罗山县东舖公社第一书记 刘荣月

附：《关于对刘荣月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2年6月8日)

中共罗山县委

41、《检查》

(1962年5月29日)

原中共罗山县监委副主任、县水利局长 连水发

附：《对连水发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2 年 6 月 12 日）

中共罗山县委

42、《补充检查》

（1962 年 6 月 13 日）

原中共罗山县竹杆公社第一书记郑廷怀

附：《关于郑廷怀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2 年 6 月 8 日）

中共罗山县委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4:35

冰雪连君：我在为《哭天：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百县典型调查.第一卷》出版，做最后一次调查。跑得地方比较多，估计会很忙一阵子。这事忙完，就窝在山里写书，没有特殊原因，这一辈子大概都不会再外出调查了。实在是心累、人更累！也跑不动了。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4:49

谢谢冰雪莲！谢谢 chenying 、你就歇歇吧 、说假话唱红歌 、长空鹰击 、清江盈月 诸君的顶贴支持！

接着发。囿于事情多，大概本帖不会很连贯地发出。不过，我会尽力而为，不会太监地。

潢川县

43、《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1960 年 9 月 30 日）

中共潢川县委

44、《关于潢川县去冬今春在粮食工作上所犯严重错误的结论（初稿）》

（1960 年 9 月 7 日）

中共潢川县委常委

45、《系统检查》

（1962 年 7 月 6 日）

原中共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 张作和

附：《关于清除张作和出党的决定》

（1962 年 6 月 27 日）

中共潢川县委

46、《坦白交待罪恶事实》

原中共潢川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 马振兴

息县

47、《对我所犯错误的再次检查》

（1960 年 10 月 24 日）

原中共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

附 1：《关于蜕化变质份子徐锡兰的处分决定》

中共息县县委

附（2）：《关于蜕化变质份子徐锡兰的处分决定》

（1962 年 6 月 14 日）

中共息县县委

附（3）：《对于县委对我的处分决定的认识和态度》（1962 年 6 月 23 日）

徐锡兰

附（4）：《对于县委对我的处分决定的认识和态度》（1962 年 6 月 23 日）

徐锡兰

48、《个人检查》

原中共息县县委书记处书记 李元庆

附：《小组意见》

正阳县

49、《关于在社会主义全面跃进中发生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逼死人命的检查报告》（1958 年 4 月 15 日）

中共正阳县委

固始县

50、《个人检查》

(1962 年 4 月 26 日)

原中共固始县委书记 石绍举

附 (1):《对蜕化变质分子石绍举所犯罪恶事实的处分决定》

(1962 年 5 月 3 日)

中共固始县委

附 (2):《对县委处分决定的意见》

(1962 年 4 月 27 日)

石绍举

淮滨县

51、《自我交待》

(1962 年 12 月 26 日)

原中共淮滨县期思公社党委第一书记 蒋学成

附:《对蒋学成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1963 年 2 月 13 日)

中共淮滨县委员会

罗山县

52、《关于发生浮肿病造成死人的检查报告》

(1960 年 4 月 15 日)

中共固始县委

53、《关于发生浮肿病造成严重损失的检查报告》

(1960 年 6 月 (?) 1 日)

中共固始县委

54、《在 59 年冬 60 年春错误检查》

(1962 年 3 月 26 日) 原中共固始县委书记处书记、胡族公社第一书记 何永秀

附录:

1、《关于在粮食问题上所犯右倾保守错误的检查报告》

(1958 年 7 月 31 日)

中共罗山县委

2、《我的检讨》

(1959年10月8日)

原中共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 李树荣

3、《补充检查》

(1959年10月14日)

李树荣

全书60万字，图片20帧；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4:53

谢谢朱奇君的勉慰！好像是熟人？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4:56

关于信阳地区发生浮肿和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并各地、市、县委：

现将中共信阳地委关于信阳地区发生浮肿病和其他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送上。省委认为：信阳地区一部份县、社发生的浮肿病和死人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恶果。这是令人感到非常痛心的。

所以发生这种严重情况，当然有它的客观原因，去年夏季以来旱灾严重，造成一部分地区减收；个别人民公社的大队或小队组织不纯，少数坏人乘隙破坏。但决不能认为这是造成上述严重情况的主要原因。主要是由于领导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次关于关心群众生活的指示，对群众疾苦关心不够，对群众生活安排得不好，对食堂管理缺乏具体检查，对严重旱灾所造成的损失漠不关心，没有把分配、征购和安排群众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征了过头粮，同时对部份地区发生的反瞒产现象未能及早坚决制止，对某些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的思想状态也估计不足，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不少干部又在抓生产的时候，对劳逸结合注意不够，对群众性的卫生工作和疫病防治工作抓得不紧，以致影响了群众的生活问题，在部分地区还造成了严重的疫病流行和死人现象。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同当前大跃进的形势是很不相称的，必须切实记取这一教训。

省委对信阳地区所发生的严重问题，虽然发现较早，但是采取的措施不够有力，致使信阳地区的问题未能及早得到妥善解决，省委应负重要责任，请求中央给予处分。

信阳地委必须从这一次惨痛的教训中，进一步作深刻的检查，认真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和生产生活一齐抓的指示，切实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对于尚未治愈的浮肿病人，要突击治疗，限期消灭。特别是要坚决贯彻执行最近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整社和“三反”的指示，普遍整顿干部的思想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信阳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应当通过整社彻底解决。对于混进我们队伍中的个别坏份子，必须坚决清洗，以纯洁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各地、市、县委都应当从信阳地区所发生的问题中，吸取教训，并且应当根据省委这一报告的精神，向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教育。

我们相信，这样做的结果，一定会把坏事变成好事，进一步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人民公社，从而更加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保证实现 1960 年的持续大跃进。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一九六〇年四月六日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5:00

关于发生浮肿病、紫疽病和其他疫病造成死人情况的检查报告

中共信阳地委

省委：

两年来，我区同全国一样，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法宝”的光辉照耀下，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出现了持续大跃进的形势，工农业生产超额完成了计划，各项工作都有很大发展，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都取得了巨大胜利。目前，全党全民正以坚强的雄心大志，更大的革命干劲，为实现一九六〇年持续大跃进而奋斗。

但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由于自然灾害的袭击和我们存在着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对群众的生活安排和疫病防治关心不够，因而，从去年十一月份以来，在部份地区先后发生了浮肿病、紫疽病和其他疫病。据今年三月底统计，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疽病和其他疫病累计 596, 176 人次，死亡 71658 人（包括正常死亡在内），占总人口的 0.85%。其中，问题严重的公社 60 个，占全区公社总数的 31.25%；问题严重的大队 1, 100 个，占全区大队总数的 24.4%。尤以固始县为最严重。全区现有浮肿病和其他疫病 79, 627 人，都已经全部集中，正在积极治疗，不久即可痊愈。从上述情况看，发病和死亡率是极为严重的，使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深感痛心。

所以发生如此严重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由于我们的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所造成的。具体说来：（1）去年夏秋大旱，广大群众日夜苦战，加之冬春雪雨较多，气候骤寒骤热，变化异常，对人们的身体影响很大。（2）部份地区的群众生活一度安排得不够，少数食堂曾经一度发生停伙现象，部分食堂曾经一度吃粮较少、吃菜过多，热量不够，营养不足，促使了浮肿病和其他疫病的发生。（3）劳逸结合不够，不少地区对生产任务要求过急过高，劳动强度过重，休息较少，睡眠不足，久而久之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抗病力减弱，以致发生了浮肿病。如水利工地、工厂、机关、学校等，他们吃粮每月都在 30—50 斤，有些人也发生浮肿病，就是因为劳逸结合不够所造成。（4）群众性的卫生工作，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不讲卫生的不良习惯，如喝冷水、喝塘水、饮食不卫生等，还没有完全改变。尤其是对大旱灾之后可能发生疫病流行认识不够，预防不力，再加上有些地方病、慢性病和流行病没有完全消灭，都是造成浮肿病和其他疫病的重要因素。据固始等十一个县，从 42,707 个浮肿病例中检查，因慢性病引起浮肿的 21,324 人，占 49.9%，其中心脏病 7,736 人，肝脏病 1,780 人，肾脏病 3,056 人，肺结核和哮喘病 8,752 人。据固始县对 19,000 个浮肿病人检查，有 27% 的人有血丝虫，30% 的人有钩虫，80% 的人有蛔虫。另据新蔡县重点检查，70% 的人有钩虫。（5）浮肿病易治易发，多次复发（多者有的复发三、四次），体质减弱，极易引起合并症，增加了治疗上的困难，造成了严重的死亡。据固始县报告，现有病人中，发生合并症者 5,756 人，其中：腹泻 1,718 人，肠炎 763 人，便秘 385 人，痢疾 1,083 人，肺炎 237 人，肺脓炎 87 人，支气管炎 510 人，哮喘 316 人，肝硬化 87 人，腹水 674 人。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5:04

我是无线上网，发了两次图片失败了。以后就不发图片了，只发文字部分。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5:07

kadafeissss 君：电子版那个我不会，我基本上是电脑盲，发帖还是猫友们教会的，现在还是只会发帖。嘿嘿，真是不好意思～！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5:12

朱奇兄：我想起你来了！哈哈！没有正式出版，刚校对完，在联系出版社。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5:24

回帖人: 仰竹居士 影响力指数: 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4-24 15:18:15
跟帖回复: 第 34 楼. 很想得到京客先生大著!. ++++++嘻嘻, 哈哈,

(开玩笑地小声耳语): 不白给, 一本书百多元(加特快专递费、关托费等), 一度猫友发信要书的太多, 送了十几本后, 我也吃不消。这 22 年来, 我的书都在香港出版, 我可以请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帮助您和其他读者代购。 (接上文) 从发生疫病以来, 在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 我区各级党的组织都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 第一, 全党动员, 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 开展了群众性的防疫灭病运动。几个月来, 各级党委都把抓生活、抓治病放到了首要位置, 并且提出了全党全民总动员, 千方百计, 不惜一切代价, 采取最有效的办法, 迅速彻底消灭疾病的要求。全区抽调了 20, 817 名干部, 7, 195 名医生, 14, 939 名护理人员, 投入了防疫灭病的工作。同时, 组织了大批力量, 逐社、逐队、逐食堂、逐户、逐人进行了几次全面大检查, 了解了病情, 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开展了群众性的防疫灭病运动。第二, 党委(此处 8 字不清——编者)检查食堂生活。各级党委对生活安排, 都先后进行了多次检查, 召开了各种会议, 查明情况, 对缺粮地区, 先后拨了 57, 234 万斤粮食统销指标, 把粮食统销指标和购粮证一律发到食堂, 保证了缺粮地区每人每天平均吃到十二两(商品粮)粮食, 并且大抓了蔬菜生产(全区共种蔬菜 260 万亩), 大制各种淀粉(共 8, 000 多万斤), 大量采集各种代食品。对缺款购粮的地区, 先后拨救济款、贷款、调整定金、穷队扶植款 5621. 5 万元, 并且发动群众大力开展了多种经营, 组织了收入, 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购粮款的问题, 而且 70%的大队保证按月发放了工资、对缺柴、缺衣、缺草等问题, 都采取了各种办法进行解决。最近一个时期, 各级党委特别强调了抓生活, 组织全党和全体干部普遍学习了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 注意工作方法”的著作, 及中央和省委的有关指示, 大大提高了干部的政治觉悟, 加强了食堂管理。我们决定各级干部下食堂, 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全区从县、公社、大队抽调了 52, 471 名干部, 分工包干到 50, 184 个大队,(此处 13 字不清——编者)个食堂由小队干部包干), 对全区食堂普遍进行了整顿。在整顿食堂中, 全区清除炊管人员中的不纯份子和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份子 7, 444 人, 增添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 14, 717 人, 大大纯洁了食堂的队伍。在食堂管理上, 大力推行了以人定量, 食物到食堂, 指标到户, 凭票就餐、节约归己的办法, 做到了计划消费, 节约用粮, 改善了管理。在全区范围内, 大力开展了以做饭蒸汽化为中心的炊具改革, 大大节省了燃料, 节省了劳力。通过这些措施, 大大改进了食堂管理, 得到了广大群众的良好反映。 第三, 大抓治疗。我们的措施是: 不论轻重病人, 一律采取了集中免费治疗的办法, 重者集中到县, 轻者集中到公社, 一般轻微的集中到大队。为此, 县增设临时医院 71 个, 社增设医院 598 个, 大队增设医院 2, 639 个。除集中了 7, 195 名医生和 14, 939 名护理人员外, 抽调了 21, 908 名干部驻院领导和护理。在治疗方法上, 采取了土法与洋法结合、中医与西医结合、医务人员与群众结合、治疗与预防结合的办法。一方面由商业部门供应了大批药品和药械; 一方面发动群众献计、献策、献秘方, 共献出和创造千余种土法治疗浮肿病的办法。这种土法治疗, 材料充足, 价格便宜, 效果良好。在治疗期间, 特别强调了休养, 对病人的生活, 作了特殊照顾, 规定每人每天吃到一斤粮食, 二两肉, 一两红糖, 二斤青菜, 四钱食物油。对于治愈病人, 一律采取了集中短期休养的办法, 务使其身体恢复健康后才参加生产。各个战线和各个部门都积极参加和支持了防疫灭病。广大干部和群众发挥了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和崇高的阶级友爱精神, 把病人当做自己的亲人一样来对待。许多干部腾出了房子, 拿出了衣服, 输出了鲜血, 为病人治病。驻院干部和医务、护理人员给病人熬药煎汤, 送茶送饭, 喂吃喂喝, 端屎端尿, 日日夜夜, 守护治疗, 因而使病人受到很大感动。由于全党全体干部和医务、护理人员的努力, 大大减少了死亡, 缩短了治疗过程, 使许多病人早日恢复了健康。 第四, 在治疗的同时, 大力开展了全面的预防工作。首先, 除强调安排好生活以外, 供应了 2, 000

万斤黄豆，疫区每人每天喝一两豆子的豆汁，增供了 200 多万斤植物油和动物油，组织群众大量捕鱼，改善群众生活，增强抗病力。其次，强调了劳逸结合，规定一般劳力每天劳动时间不超过十小时，除轮班生产者外，夜晚不准加班，（此处 14 字不清——编者）根据体力强弱和生理特点，（此处 8 字不清——编者）的病人，一律停止劳动，进行休养。其三，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进行了大扫除、大洗刷、大清剿、大熏蒸、大洗澡等活动，广泛地进行了卫生知识和防疫的教育。[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1/4/24 15:27:03 编辑过]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5:42

通过上述措施，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疫情得到了很大好转，现已制止了蔓延，基本上停止了死亡，现有病人的病情大大减轻，多数在恢复阶段，少数在积极治疗。尽管如此，但是疫病所造成的损失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第一，由于我们存在着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对旱灾情况估计不足，工作安排不切合实际。我区去年遭受了数十年来所未有的严重干旱，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党全民向旱灾作了顽强的斗争，经过八十多天的努力，使多数地区获得了丰收，这是伟大的胜利。但由于地委对灾情调查研究不够，对旱灾所造成的极大不平衡性和复杂性，特别是旱灾发生在我区主要产量区所造成的损失，对群众生活的困难估计不足。因而对灾情估计不足，产量估计偏高。在工作的具体安排上，对灾区与非灾区区别不够。在粮食征购任务分配上，不够完全合理，有的地区购了过头粮，没有把分配、征粮与安排群众生活恰当地结合起来，有些地方重视了征购，忽视了分配工作和安排群众生活。给工作上增加了不少困难。我们对当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缺乏具体分析，部份地区错误地进行了反瞒产运动，使情况更加复杂化。在生活安排上，对灾区重视，对丰收地区重视不够，致使一些丰收地区也发生了一些问题。今后，必须坚决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在任何时候，对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调查研究，细致分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才能正确地指导工作。

第二，对少数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的思想状态估计不足，解决不够，致使各级领导难于掌握真实情况，增加了工作上的困难。经过反右倾的斗争，绝大多数干部政治思想觉悟提高了，革命干劲更大了，这是应当肯定的，必须加以爱护的。但是某些基层干部理论水平较低，他们对右倾思想和反映工作上的真实情况划不清界限，不敢大胆地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即便是领导干部下去，有的基层干部也不完全说实话。因此，地、县委较长时间对下边真实情况了解不够，这就使许多问题发现较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所以，必须教育干部，划清思想界限，解除思想顾虑，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好说好，是坏说坏，对党不能有一点隐瞒。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情况，执行方针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

第三，从我们的工作上说，对思想、生产抓得紧、抓得具体，但对生活重视不够，对公社化后集体生活的新特点认识不够，对集体生活的管理还缺乏一套完整的经验，造成了某些食堂管理不善。有些地区和某些同志对群众的干劲越大，越要关心群众生活；越关心群众生活，

群众的干劲越大的道理，还理解得不够。所以，往往只注意布置生产任务，忽视安排群众生活；强调干劲，忽视休息，致使有些地区的群众生活不能得到全面妥善的安排，影响了群众的劳动热情和健康。因此，今后必须教育全党对思想、生产、生活一齐抓，而当前应当突出地抓好生活，加强思想教育，推动生产，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

第四，我们平时对地方病和慢性病的防治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没有完全消灭，影响了某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对旱灾可能发生的疫情估计不足，对早预防群众（此处 13 字不清——编者）治本。当疫病发生时，各级党委都很重视，先后采取了各种措施，一直坚持了集中治疗的方针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个别县委和某些基层党组织在春节后产生了麻痹思想，放松了对防治浮肿病的领导，致使许多已治好的病人旧病复发。这一教训，必须牢牢记取，任何工作都必须一抓到底。

第五，绝大多数基层干部思想作风是好的，但少数基层干部思想作风不纯，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关心群众生活，甚至贪污多占，铺张浪费，脱离群众；个别基层组织不纯，被少数坏份子所操纵，他们贪污偷盗，挥霍浪费，投机倒把，胡作非为，破坏党的政策。如光山县泼河公社五一大队刘洼小队坏份子管德义（当过伪甲长），利用小队长的职权，偷盗和贪污粮食 1,520 斤，以每斤大米一元多的高价，大搞黑市成交，先后贪污公款 200 元，扣发社员工资 140 元，并用大米作为诱惑手段，奸污四个妇女（该犯已被逮捕）。因此，我们的许多正确措施不能得到贯彻执行，在工作上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据此，我们正在大力贯彻中央关于“三反”的指示，下决心整顿基层组织，纯洁干部队伍，改进工作作风，改善工作方法，提高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上述问题，确实是严重的，我们下决心接受这一教训，教育全党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改进工作作风，改进领导方法，坚持调查研究，克服主观主义与官僚主义，高度关心群众生活，加强食堂管理，认真解决当前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开展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彻底消灭各种疫病，保护群众的身体健康，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们也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有办法，能够在短时间内彻底消灭浮肿病和其他疫病，保证胜利实现 1960 年全面持续跃进。

造成这一损失，地委应负主要责任。为了弥补损失，挽回不良影响，从中记取教训，我们请求省委给我们以严厉的处分。

上述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共信阳地委

1960 年 4 月 4 日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5:47

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原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 路宪文

最近地委派人两次来和我查对材料，对每个问题都很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对我的思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问题在情节上有不够确切的地方，我向来查对材料的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看了地委所写的材料，使我心惊肉麻。我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比我原来估计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恶滔天，残酷毒辣。使我跟深刻的认识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我的错误思想腐蚀了信阳地区党的组织，使它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上了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也是惨痛的损失。同时也跟进一步的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经过贯彻党的九中全会决议，在信阳地区开展的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彻底的清算了我的错误和罪恶，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纯洁了信阳地区党，在信阳地区重新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保卫了三大（面）红旗，把信阳地区党的工作引向正确的轨道，恢复发展了信阳地区的生产，救信阳地区人民出水火，使信阳地区人民重见真理，再见光明，过幸福的生活。回头看我的错误和罪恶遗臭万年，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难以弥补。每想至此我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向前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前途无限光明。每思至此我又看到了自我改造立功赎罪，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前途，鼓舞和增强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决心从错误和失败中站起来，用流过血泪的经验和教训把自己武装起来，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效犬马之力。

过去的两年，是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极大困难的两年。外有帝国主义的破坏，现代国际修正主义的压迫，内有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我的错误给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两年也是我们党取得伟大胜利的两年。在国际上我们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彻底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保卫了马列主义，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了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组织了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入世界人心，成为世界人民的旗帜。在国内我们党的九十（应为中——编者）全会总结了大跃进的宝贵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和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使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政策更加完善，使国民经济建设走上更健康的发展到了，胜利的进行了整风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改造了党的作风，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两年的进步实在是巨大的。我由于犯了错误使我长期离开党的政治生活，离开了群众队伍，我思想上落后了一个时期。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材料，一切都是新的。过去自己不敢想不敢做的事，自己思想上认为我错误的曾经加以反对的事，现在都成了正确的为党所提倡的事；过去自己认为好的东西现在都成了坏的东西，加以反对的东西。今昔对此（应为比——编者）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对比，更深刻的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深深感到自己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远远的离开了党的原则。在大跃进的胜利的声浪中自己在思想上已经不自觉的僵化了，变质了。自己的头脑怎么能不犯严重错误呢？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了。越想越后（害）怕。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〇年春，信阳地区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主要表现在：把特大的灾年当作丰收年安排工作，不搞生产救灾，大搞征购，大搞工农业基本建设，在工作方针上完全脱离实际脱离了群众。在争购粮食工作中错误的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大搞反瞒产运动，

把灾情引起的一切社会现象（逃荒、杀牛、丢小孩、破坏尸体）都归之于两条路线斗争、或敌人破坏，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混淆，用专政的办法加以处理，在一系列上的政策上脱离了党的原则，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在反右倾斗争中之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方针和方法，打击了坚持正义意见的同志，纵容了错误思想，打击了正气，发展了邪气，发展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作风，特别是以错误的办法打击了用书面或口头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更完全堵塞了党内外言路，造成了恐怖情绪。大刮共产风，把群众私有的一些财产也收走浪费了，陷人民于死地。在错误发生以后又不敢大胆正视错误，采取彻底的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反而顾虑重重，多方面隐蔽错误，使错误长期不能纠正，一错再错，就不能不给党的事业造成骇人听闻的惨痛的损失。致使大批群众死亡或身体遭受摧残，大量牲口死亡或瘦弱，失去了生产能力，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有些严重的地方妻离子散，绝户灭村田地荒芜，房倒屋塌，十室九空，弃尸山野，使人民群众遭受极其惨痛令人寒心的损失。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失则更是无法估计的。实在痛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使人民群众遭受如此严重怨痛，是不能容忍的。

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经过全党全民的斗争，仍然取得了一定收成。如果正确的分析形势，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的进行分配安排群众生活，认真的组织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困难是可以渡过的，这样严重的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我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离开了马列主义原则，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执行了一套完全错误的方针政策，错误的工作方法，严重的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人为的扩大了灾情，制造了紧张和混乱。我是信阳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错误思想起了主导作用，因此，对信阳地区的错误我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一个党员的地位越高，他所担负的责任越大，他的错误的影响和造成的恶果就越大，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托（托），给党和人民造成了罪恶，万分痛心。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5:52

回帖人: lijian12 影响力指数: 0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4-24 15:50:17

跟帖回复: 第 63 楼. 我甚至怀疑，这一切，是只会革命，无能治国的当政者，所采取的减少人口的阴毒措施。因为问题出现，长达三年之久。.

+++++

全国性的大饥荒，是从 1958 年 11 月～1963 年夏收。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6:02

经过两年来的学习和反省，我深刻地认识了使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我脑子里非无产阶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了我的头脑。区别干部队伍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个人和集体和群众的关系。

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行为应当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尊重客观真理。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无条件的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利益，忠心耿耿的全心全意的为群众服务，当群众的公仆，一刻也不应该脱离群众。而我的错误正集中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从小娇生惯（应为惯——编者）养，过着较富裕的生活，养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主观片面，好大喜功，看不起劳动人民。入党以后一帆风顺，未受挫折，我的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未得到彻底改造。大跃进以来，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喜欢表扬，怕受批评，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不敢也不愿正视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誉，不顾客观可能，不顾群众利益，不听群众意见，根据主观愿望，站在群众之上发号司令，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群众去完成任务。这样就使自己的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品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一旦僵化了，停止进步了，在政治上就必然变成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鼠目寸光的庸人，就难于接受新鲜事物，识别方向，明察真伪，就不能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关于（应为心——编者）群众生活，正确的领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必然走上脱离党的方针路线的错误道路，犯严重的错误。尤其这种错误反映在一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身上，就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的这些错误思想表现在工作上：

首先，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我的思想方法上是极端严重的主观主义。我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恰（应为结——编者）合在一起，就发展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迷信主观想象，一点也不相信群众的荒谬绝伦（应为伦——编者）的程度。把自己看做高于群众的所谓“聪明人”，总认为自己比群众觉悟高，经验多，是革命的，而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则看做一群庸俗无智、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可信任的人。口头上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实际工作上则要求群众听自己的，一旦工作遇到困难，不检查自己的思想计划方针政策是否脱离实际，则即不加分析的责备基层干部和群众右倾保守落后，尤其在粮食工作上表现的最突出，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对待群众的观点和态度。

大跃进以来，信阳地区刮起了严重的浮夸风。这种浮夸风所以能在全区范围内刮起来，长期不能得到纠正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一九五八年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在工农业生产上制定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指标，号召下边去完成，只要报成绩大就不变（应为辨——编者）真伪盲目相信加以表扬，或开现场会加以传播，完成不好的就批评其右倾，光看缺点，否定成绩，给群众泼冷水。逼得下边弄虚作假，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一九五八年罗山县委小麦估产低，认为其右倾，忽视两条道路斗争，错误地批评了罗山县委。西平县委组织部长反映西平小麦七斤（千）三百斤有虚假，地委支持了西平县委，批评了反映真实情况的组织部长。这些错误的作法，促进了浮夸风，起了极坏的作用。党中央毛主席早就提出了纠正浮夸风，但是信阳地区始终没有认真的进行过纠正。一方面我错误的认为怕纠正浮夸风打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错误的认为，许多数字已经公布，甚至开了现场会组织了参观，公开纠正觉得不好讲，不好看，自己也怕强调反浮夸犯错误。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我脑子的反映。由于许多数字没有落实，迷糊了自己的眼睛，思想上长期不摸实底，浮夸风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

一九五九年秋季反右倾斗争以后浮夸风共产风发展到了最高峰，是造成信阳地区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在反右倾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把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斗争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打击了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打击了执行党的政策关心

群众利益的同志，保护和发展了浮夸风、共产风。首先我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对信阳地区夏季粮食征购工作做了错误的保证。一九五九年信阳地区夏季征购没完成任务主要是浮夸产量估计过高，脱离实际，当时强调贯彻分配政策，超产奖励，妥善解决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矛盾，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却错误的认为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片面强调照顾群众利益忽视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夏季有些地区已经透底，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而我却认为群众私分瞒产，麦收后多吃浪费了粮食。夏季没有完成任务，我思想感到有压力，不好看，不好向省委交代。因此，强调秋季要早下手抓粮食征购，注意两条道路斗争。要保证完成任务。其次在我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斗争了曹铭同志，认为平舆县夏季粮食征购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曹铭同志思想右倾，忽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曹铭同志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对群众情况是关心的，对曹铭同志的斗争是错误的。对黄德功、息县农场张场长的批判也是错误的。由于对曹铭同志的斗争主要是以粮食征购问题为中心，对造成信阳地区的错误影响极大。曹铭同志反映西洋店有灾情，主张早搞生产救灾计划是正确，批判曹铭同志不积极抗旱，及早提出生产救灾也是错误的。其三，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奖励生产队开荒、副业下放生产队，把大队猪下放给生产队食堂和群众喂养，等都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后，提倡大搞集体养猪，大办百头猪场，普遍试办穷队过渡，共产风又刮起来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违背了中央关于执行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政策的精神。共产风给群众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破坏了群众私有的一点家庭付业。其四，对张树藩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张树藩同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是正确的，春季在遂平县拨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是关心群众的，对秋季粮食产量的估计较接近实际，我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胡友录同志反映生产中的问题是正确的，我认为胡友录同志思想右倾，只看缺点不看成绩，因而批判胡友录同志是错误的。信阳地区在反右倾斗争中，突出地批判了对粮食问题和浮夸伤风有意见的同志，认为对粮食征购有意见是右倾思想代表富裕中农叫喊，否认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认为对浮夸有意见，是否定成绩否定大跃进。现在看来这些同志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对这些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其结果就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堵塞了党内言路，保护和发展了浮夸的不关心群众利益的坏思想作风。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错误的以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领会和执行中央庐山会议的精神，结果就把一些反映真实情况和反映工作中错误缺点的同志不加分析都认为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的右倾思想，把一切反映粮食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意见都认为凶（是）替富裕中农叫喊，是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干部思想上的表现。这些都集中的反映了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不关心群众的痛苦，不敢正视工作中错误缺点。由于我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使许多正确的同志受了打击，忍受了冤屈，现在想起来实在痛心。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6:11

其三、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反映在我的工作作风上是：简单粗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斗争曹铭同志时，曾发生过推拉等违法乱纪行为，由于我没有采取坚决认真严肃的态度加以纠正，对造成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中普遍发生违法乱纪行为起到了开导作用。在斗争曹铭同志最初两天，采取摆材料讲道理的方法，一个人发表一套道理，互

不交锋，在小组长会上研究改进斗争方法，我错误地认为会议开的不严肃，不紧张，不像斗争会样子，提出了分析批判和逐项追根相结合。在闲谈中我又讲了斗争潘复生时的一些情况，使大家思想上发生了错觉。在最后一次斗争会上曾发生推拉等现象，我当时让大家坐下来一个一个的讲，叫曹铭坐下纪录。在小组会上我提出不要指手画脚，没有严肃批评这是一种错误。在会议结束安排工作时，我又讲了回去要注意防止违法乱纪，你们都是县级干部还老想动手动足，基层干部就可想而知更难避免。同时告诉大家既不要给基层干部泼冷水，又要防止违法乱纪现象发生的指导方法。在斗争形成相持顶牛局面时，就主动停止会议帮助干部研究方法等。由于我对这种违法乱纪现象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当作一个大问题严肃地纠正，结果使大家思想产生错觉，在各县扩干会议上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一级比一级严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大陆直连本站: <http://tiny.cc/meyarw>)

在反瞒产斗争中，我强调两条道路战争，逼着下边搞粮食，三天一个电话会议，五天一总结，对搞得好的，成绩大的，不辨真假，不问政策方法就加以表扬推广，对搞不出成绩的就批评右倾，推广了许多错误的反瞒产经验，领导上强迫命令，逼着下边违法乱纪，形成了反瞒产中的逼供信。造成了普遍的打人吊人甚至打死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听到有些同志反映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我在电话会议上讲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不能允许的，但不要简单的批评处分基层干部，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主要帮助继承干部总结经验，告诉基层干部方法。同时我认为在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死个别别人是难免的。在我这种极端错误思想支配下，对违法乱纪现象没有认真检查处理，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造成违法乱纪成风，逢会必斗打，打人合法的极其严重的现象。阶级敌对分子乘机实行阶级报复，残害群众。各种手段千奇百出，残酷毒辣。马龙山打死了张福洪向地委报告，危（畏）罪自杀，地委虽然派人检查了，但没有查出问题来，没有认真的继续追查，使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在第一次平舆会议上发现西洋店群众大量外流，我和宋书记专门召集五个外流严重的大队干部和公社书记开了一天座谈会。会议上除了统计外流情况外还反映了许多地富伪军官富裕中农破坏抗旱斗争，带头煽动群众抢秋，煽动群众等外流现象，以及一些贫农积极分子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保护耕牛，坚持生产，维护食堂的模范行为。当时有些群众回来感到上了当，当时强调安排生活，对坏分子破坏等情况稳定后再处理。回地委后召开电话会议。曾指出有些群众外流是灾情生活问题，有些是富裕中农瞒产私分逃避斗争，有些是五类分子破坏，有些是投机商贩。当时指出不论什么地方外流来的一律收容管饭吃，每人每天半斤粮食，实报实销，集中送回原地。每个收容所要派三种干部，公安干部负责审查坏分子，民政干部管生活，卫生干部管治病，当时公安局长正在专区开会，我又给公安局长讲了一次。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有些农民外逃是富裕中农煽动的，有些是少数富裕农民干部瞒产私分不叫群众吃饭农民群众外逃，有些是富裕农民瞒产私分怕斗争外流，有些是敌人破坏等。因为当时苏联专家到信阳查矿，空军等部队开现场会，怕影响不好，要求各县在二三天内消灭外流，要深入各社队调查地富反坏右，富裕中农外流情况，揭发他们的破坏活动，开展斗争，斗后管制不准外逃，有犯罪行为的要求要法办。要组织民兵巡逻等。我曾经说过：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的话，我这种对待外流群众的错误分析，和极端错误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违法乱纪行为。群众外逃求生，我把他当作坏人，不准外流更堵杀了群众的求生之路，这完全是一种国民党对待群众的办法。反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信阳五里店公社社员罗付业，贫农成分，十五岁，父母饿死。杀吃了四岁的妹子，我批准

了法办，错误的认为杀人犯法行为。而不（问）犯法原因。实际上这种残暴行为应当由我负责，因为我反瞒产饿死了他父母，使他无饭吃，逼他杀人。在光山马畈公社时听了该县委书记 刘文才（彩）的汇报还当场批准逮扑了三个破坏尸体的贫农。后来两人均死于狱中，我对这一冤狱应负直接的责任。

我的错误思想作风，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行为。我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混淆，用专政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提出的许多办法政策都是违法乱纪的。我对违法乱纪行为又熟视无睹，强调保护违法乱纪的积极性，怕给违法乱纪泼冷水，实际上就是支持纵容了违法乱纪，使之残害人民，打击了坚持正确工作作风的同志。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违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我这种对待群众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生死无动于衷，对许多政策问题采取信口开河，轻率了（应为潦——编者）草的态度，说明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脱离了群众的土皇帝。对群众的呼声利益倾（听）而不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顺我者昌，还（逆）我者亡。我的错误实在严重极了，危险极了。

其四，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对待组织的态度上是不忠诚的，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信阳地区这样严重的情况，我没有及时向省委汇报，许多重大政策问题既没有向省委请示，也没有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就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进行了处理。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情绪，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讲好典型多，讲坏典型少，怕说看消极面多受批评。死人问题一直到省委指示时才向省委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

我对待错误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想方设法掩盖错误。一九六零年元月十二日我到平舆开会，路过新蔡时见路旁村庄有群众扒树皮，我当时就认为那里的生活有问题，当即告诉县委书记叫他亲自派人去查明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认为剥了皮的树留着不好看，叫群众砍了。路过万金店见村庄有五棵没皮的树，我将同样的话告诉了平舆县委宫书记。我在火车上看到信阳长台附近有一个村有几棵剥了皮的树，我又告诉余书记派人去查，看生活是否问题把树砍掉，我说火车上来往的各种人都有不好看。一九五九年春我和杨书记路过光山泼河南一个小店又一座仿倒塌了，那里已无人。我见了马龙山说，你那破房不扒了，放在那里展览吗？我的各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助长了下边封锁消息。

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春生为告诉我毛主席要到嵯峨山，延炳玉、韩仁秉同志为此事省里开了会。延炳玉回来向我传达了省委指示，省委叫我准备死人浮肿病等材料向毛主席汇报。我交延炳玉同志去了再检查一下生活的问题安排的怎样，把原来的展览馆再收拾一下，食堂土蒸汽恢复起来，没有集中的浮肿病集中起来。我去了以后，听说韩仁秉同志把中央下放的干部都调离了，把群众也准备调到远地生产，只留少数干部积极分子接见主席，我和老延都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叫群众见主席不好。研究结果，叫中央下放干部的组长审查一下，把政治上可靠的留下，除把五类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富裕中农调离以外，多数政治上可靠的群众留在公路两旁和村庄附近接见主席。现在听说把浮肿病人调走了，把托儿所小孩调走了，只留下一部分胖的，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食堂吃了几天大米饭。实际上形成了布置假现场，蒙蔽主席，对群众影响很坏。我的思想可能对延炳玉同志有影响，我应负一定责任。

我对死人数字的统计存在少比多好的个人主义思想，因而每次都强调叫下边划清正常和非正常死亡的界限。我这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一九六零年元月十号左右到淦川

见了宋书记，他告诉我潢川已死人八千，固始死人一百多，并说老梁思想有顾虑，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省委工作来的一些同志不知道是否是党团员，到处统计死人数字，以后没有县委通知不准给他。潢川会议上我问老梁和老杨，他们都不承认有那么多。当时我批评梁德柱同志不该在县委会上批评省委工作组，应该和他们组长商量一下统计死的办法。我同意老梁注意保密的精神，所以我说工作组的组员有许多不是党团员，团员，给他们说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同时告诉他们对上级领导同志有什么说什么，对下要保密，不要乱发通报文件，叫敌人知道了不好。当前应集中抓好生活安排，不要忙于统计死人数字，以免发生消极情绪，结合安排生活摸一下底，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委写报告，张甫同志对老梁意见很大，当时我批评老梁不该和张甫顶嘴，固始死人多，对张甫招呼很好，张没啥意见，你死人少，你对张甫态度不好张甫对你意见很大。这是一种庸俗的错误观点，我的这些话促进了老梁对张甫同志不满，影响很坏。元月底我回地委，王达夫同志向我说，公安处年终统计全区死人二十三万，浮肿病死人八万，已叫各县委审核一下再报省。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的意见，弄清楚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委写检查报告。在我错误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时向省委反映。二月初在省委开会，杨守迹（绩）同志和我说死人二万多，我说有那么多，再审核一下，划一下界限。我也没有即时向省委写报告。只到三月初固始开始向省委报告死人四万多，赵书记电话会议上点了地委的名，地委才对固始死人问题向省委写了检查报告。三月下旬省委吴书记和我谈了话，我才把全区的死人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这样严重的人命关天的大问题长期没有主动向省委写书面的正式的检查报告，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毫无党性的表现。

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对中央、省委派来的同志不够尊重。李坚（中央监委）同志在省委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把信阳地区的死人情况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从固始、光山回来我找李坚同志谈了一次。决定第二天晚上向李坚同志汇报，下午正开常委会，邱进敏同志说李坚同志叫你谈话，本来因该停止常委会去见李坚同志，但当时我即借口开会未去见李坚同志。晚上地常委集体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对问题认真负责，态度严肃，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值得我学习，但当时我思想有顾虑，怕李坚同志批评，对李坚同志有些意见，说了一些不满意李坚同志的话。现在检查起来我对李坚同志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消极抗拒检查的态度，是党所不允许的。

一九六零年五月六日，地委扩大会议结束我把马龙山梁德柱留下，我问他们死人数字为什么一下由九千增到五万多。当时我思想上对这个数有怀疑。梁德柱说省委检查组逐户登记的，按工作组统计的数字，加现有人口比选举时统计的人口多一万七千多，死人没有那么多。我和梁德柱、马龙山说，你们再派县委同志亲自摸两个大队，核对一下看是否有出入，不要和工作组讲。到底多少心中也有个底。我对省委检查组统计的数字有些怀疑，怕统计得不准确，这是一种对工作组不但不尊重不相信的错误态度，严格说来也是一种抗拒检查的态度，我的这种错误思想，对梁德柱的抗拒检查起了支持作用。是党纪所不允许的。

我对人民群众的来信采取了违法乱纪的态度。光山白雀园公社民校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反映群众生活问题，当时我看了以后认为情况可能有扩大，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我不准备再去检查了，王达夫同志说还是查一下好，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就派陈正卿同志去检查。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我见了马龙山和黄文儒，问他们查的怎样，他们说没弄清，我说还是查清楚好一些。结果黄文儒回去就追查起来，并把来信人扣起来了，陈正卿同志回来回报才知道扣起人来了，我和王达夫叫他立即放出来，我虽未叫扣人，但我叫黄文儒查来信人是错误的我应负责。专署工程局党员干部邢贵良用地委信纸和名义给信阳县委写了一封信批评县委，我听

说后认为借地委名义批评县委是违法行为。叫公安局破案，并进行批判斗争，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鸡公山会议后纠正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信阳县监委书记胡修玉同志向中央写匿名信反映信阳地区死人情况，转信阳地委处理，我同意王达夫同志意见叫公安处侦察破案，进行斗争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现在看来这些同志都是对党负责的，关心群众生活，同党如实反映情况的好同志，但是我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对这些同志的来信采取了压制民主，打击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是一种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

我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愿接受党任何严厉处分。我希望党给我留一个自我改造、立功赎罪的机会。

由于我长期脱离党的政治生活，我的思想落后了。再加我的错误对我自己精神上的压力很大，思想很混乱，因此我的检查写的仍不系统不深刻，有些观点还可能有错误。我熟（热——编者）诚的希望省委、地委能给我以帮助，挽救我。

路宪文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本书主编一句话评语：满篇避重就轻、避实就虚，基本上没有对死难民众的忏悔之心！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6:14

信阳地委书记处第一书记路宪文照。 1963年9月，路宪文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文革”后获“平反”!!!

[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1/4/24 16:16:38 编辑过]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6:19

资深孩童 影响力指数: 1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4/24 16:12:55 跟帖

回复: 第 78 楼. 京客兄你们，多日未见，幸会幸会！

全国人民（除毛左，因为他们不是人）感谢你提供的珍贵资料！

这本书出版后敬请告知，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

啊哈，你现在的马甲一穿，我就不知道是哪个了嘛。肯定是熟人，那就开句玩笑喽：不好意思地说一句，不要带表哦。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6:21

有事，待发。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8:47

上个世纪 80 年代，我曾经采访过信阳事件中的地委干部、县委书记、县委负责人、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和原人民公社受难的社员近百人。今年春节后，有朋友愿意出资找人整理录音，结果，百余盘录音磁带全部粘连了，没有一盘能够整理。心痛而无语！

朋友当面将一大堆录音磁带摔在地上，边踩边怒骂我是“文盲”、“太可惜了”、“无知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8:50

可惜了我那些不知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的珍贵磁盘！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9:10

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

中共信阳地委

省委并报中央、中南局：

我们于十二月八日至十四日先后召开了地委常委会议和县、市委第一书记(一部分县是领导小组)会议，传达了最近中央、主席的指示，以及王从吾、徐子荣、王任重同志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议的精神。与会同志认真进行了学习讨论，普遍检查了思想，澄清了糊涂观念，提高了阶级觉悟，明确了指导思想。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中央、主席以及中央、中南局负责同志和省委的指示极端重要，完全符合信阳地区的情况，表示坚决拥护和贯彻执行。在这个基础上，检查了前一段的工作，初步总结和交流了整风运动的经验，对今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现将几个主要问题报告如下：

(一)

在中央、中南局的正确领导和省委的直接指导下，我区整风运动已经普遍展开，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并且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果。全区十六个县、市的整风运动都已经展开，一百八十七个公社，开展整风的一百五十六个，占百分之八十三；四千四百九十七个大队，开展整风的二千九百四十八个，占百分之六十二点九。投入整风的工作队中，有区级以上干部二千余人，参加整风学习的各级干部十三万余人（其中：地专直两千余人，县直万余人，公社一万三千余人，大队、生产队近十一万人）。对于一部分有罪行和有严重错误的人，已经集训了八千余人，特别集训五千余人，斗争和批判了一万余人。有些罪恶极民愤重大的已经作了初步处理，其中已经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九百八十三人，逮捕法办的二百七十五人。已经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个大队的领导权被夺了过来，正在进行夺取领导权斗争的有一千六百二十一个大队，其余大队正在积极进行准备，不久即可展开斗争。

目前，全区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广大群众的革命情绪十分高涨。在已经开展斗争的地方，斗争坏人坏事，彻底打倒阶级敌人，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舆论中心，街谈巷议，奔走相告。群众说：“毛主席知道了，派干部来了”，“真共产党回来了，老八路回来！”。有的群众对着毛主席像说：“你真是我们的大恩人。”贫农、下中农积极分子，主动组织串联，广大群众积极起来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潢川来龙公社东升大队贫农社员王新全连饭都顾不上吃，跑了三个村串联苦主数十人参加斗争。平舆县平舆公社小陈庄大队开展斗争后，工作组每天都收到检举信一百多封，工作组走到那里，苦主就跟到那里诉苦，罗川县竹杆公社同心大队湛山沿生产队五年级的贫农女学生项仙枝，写给毛主席的控诉信缝在衣襟里面一年多未发出，这次拿出来交给工作组，要求替她冤死的父亲、妹妹伸冤报仇，并和她母亲串联六户苦主找工作组诉苦，斗倒坏人。真正树立了贫农、下中农优势的地方，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潢川县来龙公社刘小集大队的社员胡桂芝说：“去年是阴天，遍地是豺狼，今年是晴天，共产党派来打狼的人。”还没有开展斗争的地方，在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广大群众跃跃欲试，有的积极要求派人去领导，有的自行串联苦主准备斗争，有的急忙赶回原籍参加斗争。商城县钟铺公社仙桥大队贫农社员路德友逃住在横川县，听说要斗争坏人，连夜从潢川跑回去参加斗争。该社王寨大队贫农社员曹花荣的丈夫去年被小队长罗德卿逼死，又被其霸占为妻，罗不让她出门，便在夜间偷偷跑到公社找工作组要求替死去的丈夫伸冤报仇，惩办坏分子罗德卿。新蔡县练村公社郑庄大队刘庄小队贫农社员马赵氏的儿子，去年被小队干部打残废，马赵氏听说要整风，跑二十多里路去找工作组诉苦，要求工作组去领导斗争坏蛋，报仇雪恨。在群众革命斗争的压力下，坏人普遍紧张恐慌，有些已经开始动摇，低头认罪，找工作队或向领导上写信交代自己的罪恶，要求给以惩处，并积极揭发别人，也有的主动找群众认罪检讨；有些坏人还在继续顽抗，抵赖罪责，收买群众，企图混过去；少数的继续为非作歹，制造谣言，破坏生产，破坏公共财物，捣乱生活安排，拦路抢劫，组织偷盗，煽动群众制造混乱，甚至持刀行凶威胁群众；个别的畏罪逃跑、自杀。整个城乡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坏人已陷入革命群众的汪洋大海，革命的大风暴开始席卷全区。

紧密结合整风运动，广泛宣传贯彻了中央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与困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全力支持下，普遍开展了生产救灾工作，安排了群众生活。发放了大批救济物资。已解决棉衣一百一十七万多件，被子十四万多条，住房六十三万多间（其中社队腾出八万多间，修补五十五万多间），发动群众拾柴四亿多斤；采取各种措施扑灭疾病，减轻了疾病的蔓延；开展了多种经营，执行了半日集体劳动半日休息的制度，活跃了集市贸易，群众生活得到了初步安排，绝大部分地区群众情绪安定了。向困难作斗争取得的成就，大大促进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迅速发展，整个形势的发展对我们是有利的。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问题进一步地揭露,愈来愈清楚地证明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凡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的地方,揭发的问题比我们原来了解的严重很多,而且是越揭发越严重。过去认为淮南严重,淮北较轻,从这一段运动揭发的材料看,淮北各县的问题也很严重,有些县、社的严重程度也不亚于淮南。淮北八个县的第一书记除遂平、西平两县的县委第一书记问题比较轻一些,态度较老实外,其余已全部烂掉。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一万八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八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死三万来人,现在增加到近十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也很严重。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十三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其余十二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楂岈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六百余人,现在揭发死人近四千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队人口死亡达百分之三十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十二个中学,有八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高中和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即达二十八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受了极大的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正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全区十六个县市,按照现有的材料排队,只有新县一个县,按现在所了解的材料是二类,“五风”十分严重,敌人利用“五风”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部分损失;其余十五个县市都是三类,已经完全烂掉或者基本上烂掉,敌人篡夺了领导权。据整风开展较早的光山、潢川、商城、固始、息县等五个县的排队,六十二个公社中,没有一个一类,二类是十个社,占百分之十六点一三;三类是五十二个社,占百分之八十三点八七;一千三百二十五个大队中,一类九十四四个,占百分之五点四,二类三百一十七个,占百分之十八点三八,三类一千三百一十四四个,占百分之七十六点一七。从县社原有的领导成员看,十六个县、市委书记处的书记一百二十八人中,属于错误不大的一类二十八人,属于于错误严重或者有一般罪恶的二类二十八人,属于罪恶十分严重的三类七十二人;县委委员和正副部长二百六十七人中,一类八十九人,二类八十人,三类九十八人;公社党委书记和社长二百一十五人中,一类四十三人,二类四十四人,三类一百二十地方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运动就冷冷清清,敌人气焰不能很快打下去,群众情绪不安定,局面扭转不过来。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副社长一千一百人中,一类二百三十六人,二类三百三十一人,三类五百三十三人。这个排队仅是初步的,将来还一定会有变化。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不但情况愈揭愈严重,而且问题的性质也暴露得更加明显了。敌人打进来、拉过去的材料大量增加,暴露出来的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的现行破坏活动一天多于一。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情况十分突出。确山县委办公室是一个反坏集团,办公室主任黄建志是一贯道的点传师,干过伪粮警;副主任孙文芳是三青团员,干过伪保干事;四个干事,一个是地主、三青团员,一个是地主、三青团的分队长,一个是伪联保主任的儿子,一个是伪保长的儿子。商城、固始、息县、新蔡、新县等五个县已经发现反革命集团三十六起。光山县发现有二分之一的地区是和平土改,其中少数地区基本上没有搞土改。该县文殊公社梁棚大队土改运动只是走了走过场,基本上没有划阶级,全队四十七户地主、富农中,就有三十四户漏了网。这些材料说明了,信阳地区的问题是极端严重的,是敌人的大屠杀、大惨案,完全证明了毛主席指示的“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就是信阳问题的实质。

敌人所以如此猖狂达半年之久,一方面是他们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帜,掩盖着他们的反革命的本质,一度迷惑了一些人的眼睛;为一方面,还有反革命的社会基础,土改、镇反不彻底,一部分地、富、反、坏分子原封未动的保留下来了,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利用各种反革命的手段,把我们队伍中意志薄弱的人拖下水去,并且互相勾结起

来，乘机实行反革命的阶级复辟，灭绝人性的残害群众。因此，必须根据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指示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象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露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我们现在所取得的成就，还仅仅是这次民主革命补课的开始，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复杂的斗争，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19:42

(二)

整风运动的实践证明，民主革命补课和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任务是艰巨的。我区当前的敌我矛盾十分突出，又掺杂有人民内部矛盾，两类矛盾搅在一起，斗争很复杂，政策性很强。要胜利完成这两个任务，必须掌握几个重要环节。

一、正确认识信阳事件的性质，提高阶级觉悟，明确指导思想。我们对于信阳问题性质的认识，是逐步明确的。在十一月以前，认识上是模糊的。不少干部认为信阳问题是工作上犯错误所造成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负责同志于十一月先后来信阳视察工作，作了明确的指示，我们才认识了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尤其是这次学习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中南局负责同志的指示，检查了思想上的糊涂观点和错误认识，对信阳事件的认识就更加系统和深刻了。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上级党委的教导下，在斗争的实践中，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但是，在我们的整风队伍中，仍然存在着许多糊涂观念。如认为：“信阳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信阳事件是我们党犯了错误”，“路宪文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在斗争中强调保护一批人，不敢撇开原有组织，有的不是展开斗争，而采取登门道歉的办法等等。这实际上是阶级观点模糊，群众观念十分薄弱的反映。存在这种或那种糊涂观念和错误思想的地方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运动就冷冷清清，敌人气焰不能很快打下去，群众情绪不安定，局面扭转不过来。由于前一段在指导思想存在着一些糊涂观念和错误认识，某些社、队就发生了民主革命补课不彻底的情况。光山县第一批开展整风的七十四个大队，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工作，仅经过初步复查，还有十六个大队(占百分之二十一点六)是夹生饭，坏人还没彻底打倒。槐店公社前进大队运动搞了两个多月，还有三个坏人没有进行斗争，坏分子王家喜(原大队支书)还暗地召集同伙人开会，猖狂地说：“他们(指工作组)有几个红的，我们几个绿的”，群众说：“还是泰山压着头”。与上述情况相反，光山县在明确问题性质，采取了革命的方法以后，第二批开展的一百九十八个队，仅一星期的时间就掀起了群众革命斗争高潮，很快夺取了领导权。对信阳问题认识的提高，是一个斗争和实践的过程，但主要是由于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模糊，在新的斗争形势下，麻木不仁，对敌人采用钻进来，拉过去的办法，篡夺党政领导，实行反革命复辟，缺乏阶级识别能力。因而，对敌人大规模的残害群众的罪行，不能及时看透它的阶级本质。再加上敌人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利用我们工作上的错误，进行破坏活动，这就更容易模糊干部的认识。所以，今后随着运动的发展，还需要对整风队伍不断地进行整顿，武装思想，提高觉悟，使领导和干部永远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不断领导群众前进。

二、要象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实际上是民主革命补课。同时，还要彻底反“五风”，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完成革命的任务，必须采取革命的方针。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撇开原有组织，依靠工作队和贫雇农群众以及被打击陷害的好人，夺取领导权。要大张旗鼓地反复地宣传贯彻中央十二条政策的紧急指示，边宣传边执行，旗帜鲜明，团结群众，孤立敌人，把运动搞深搞透。对于原有组织中，犯有严重错误和有罪恶的人，根据情况，分别采取集中整风、集训，特别集训和撤职查办管教反省以及逮捕法办的办法，打击敌人的反动气焰，初平民愤，扫除运动的障碍。由于绝大部分原有的组织已经腐烂，所以必须依靠上级派来的干部，在各级各部门中建立领导小组，实行领导小组专政。大队暂时成立社员代表会，小队暂时成立代表小组，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废除过去的一切反动政策和规定。各县第二批开展整风的社、队，一般都执行了革命的方针，效果很好。但是，也有一些重点，运动开始时出于对斗争性质认识模糊，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方针。如光山县整风运动开展最早的城郊公社，由于运用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解决敌我矛盾，没有完全撇开原有组织，把蜕化变质分子原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万林和原十里庙大队支部书记黄立炎误认为是好人犯了错误，还利用他们继续工作，而他们却背着工作组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头里扎根子，他们后边拔根子。朱万林告诉黄立炎：“整风已快结束了，工作组走后再好好干。”在群众酝酿选举立场坚定、受打击陷害的贫农党员杨金枝当队干部时，黄立炎则召集一伙地、富、反、坏分子和落后群众连开四次小会，并在群众中制造宗派矛盾，说：“黄立炎当不了干部，就是拔掉了黄家一杆大旗”。并组织一些坏分子和落后群众冲进会场大哭大闹，捏造材料，陷害杨金枝。真相揭露后，黄立炎逃跑时还布置他的同伙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新县吴陈河公社在整风中，对原党委副书记、蜕化变质分子陈传发，不是采取彻底斗争的方法，而让他向被他吊打残害的社员胡升明家登门道歉，胡升明说：“你把我冻也冻了，打也打了，还道什么歉。”将其赶出门去，还让小孩喊口号“打倒陈传发，陈传发扣我们的饭”。这些事实证明了改良主义的方针只能混淆敌我界限，麻痹群众斗志，是不可能充分发动群众，把革命搞彻底的。

三、必须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整风运动已经开展的社、队，群众发动一般是充分的，方法是对头的，运动发展是健康的。具体作法是：一是，县市、公社、大队都召开整风会议，层层解开盖子。有上边派去的领导同志作报告，讲清信阳事件的性质，指明坏分子的罪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向坏人坏事开展斗争。对原组织的成员，根据其罪恶大小，错误轻重，分别采取集中整风、集训、特别集训等办法，把盖子揭掉，并且由派去的干部在县、社成立领导小组，这样旗帜鲜明，容易解除顾虑，发动群众。二是，工作组的干部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深入的访贫问苦。细致地选择根子，首先发动苦大、恨深、出身成份好的贫雇农和下中农，解除他们的顾虑，坚定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并且依靠他们去串连苦主，组成队伍，进行阶级教育，准备斗争材料。三是，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大张旗鼓地向坏人坏事开展诉苦斗争，先斗争群众最痛恨的大坏蛋，群众要斗争几次就让群众斗争他几次，对于所有的坏人都要通过大会小会，让群众倒尽苦水，出透冤气，进行彻底的斗争。对这些坏人的斗争，领导态度必须明朗，必须坚决，不能束缚群众的手足，更不能采取恩赐观点。在发动群众开展诉苦斗争的过程中，要反复交代政策，不准打人。与政治斗争的同时，对于这些反、坏分子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多占和掠夺群众的财物，要进行追赃退赃。四是，土改不彻底的社、队，发动群众划阶级，查清漏网地主、富农，重新给他戴上帽子，交群众斗争管制，监督劳动改造。通过划阶级，查漏网地富，在群众中进行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把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一步。五是，民主革命补课取得胜利之后，还应认真地进行复查，不漏掉一个坏人，不漏掉一件坏事，保证民主革命补课取得彻底胜利。从各个点的实践看来，这些作法不仅适用于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反“五风”斗争也应当采取这样的革命精神，才能把“五风”彻底反掉。

四、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社员代表会的作用。在整风运动中，绝大多数队都组织了社员代表会，撤开了原来组织。生产大队成立了社员代表会，代表会中组织代表委员会（上边派来的工作队干部参加委员会），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领导，委员分工管理整风、生产、生活等各项工作；生产小队组织代表小组，选举正副组长，领导生产队的各项工作。社员代表一般五至七户选一个，代表的基本条件是：贫农、下中农，历史清楚，劳动积极，和坏人没有联系，群众拥护。代表会中贫雇农、下中农成分应当占绝对优势，保证贫雇农和下中农的绝对领导，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代表会绝大多数是好的，大公无私联系群众，办事有条不紊，很受群众拥护，在领导整风和生产救灾等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如遂平县楂树山公社关庄生产队贫农赵景重被选为代表，耽心工作搞不好，向群众表示“我没有当过干部，不会说话”，群众回答说：“咱们是庄稼人，有事大家商量着干，根据大家意见咋干就咋干，你不去我们也去干”，赵景重向群众说：“我保证不学过去的坏干部，保证不多吃多占。”（群众都满意的笑了）该社李陶大队贫农马先行被选为代表后，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教导他说：“孩子，你是大家选出来的，不能学过去的坏人，咱是穷人，要为穷人办事，要和群众一条心，不要打人骂人，不要多吃多占。”现在马先行工作搞的很好，每天还替四个孤寡老人担水，经常到社员家问寒问暖，社员普遍反映“马先行真是我们好代表”。息县夏庄公社林大队贫农朱秀花当选为代表以后，表示“一定领导大家把家当好，要争一口气”，在十一月下旬寒潮来时，怕冻坏牲口，把队里的五头牲口牵到自己屋里。不少代表小组主动的积极的串连群众开展诉苦斗争，领导生产，抓生活，搞的很活跃很出色。但是有的地方，不相信群众，怕搞乱了，不敢成立代表会，也有的虽然成立代表会，只是把代表会作为宣传政策，联系群众的一种方法，没有把一切权力交给代表会，致使代表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从已有的经验证明，不仅在整风运动中，需要组织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而且为了巩固发展人民公社，搞好社会主义建设，领导和监督干部，树立民主作风，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还可以把代表会作为一种长期的制度坚持下去。

五、组织处理工作是体现政策和巩固斗争成果的重要环节。我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组织处理工作的分量很大，情节很复杂，政策件很强。因此，必须坚持“两步走”的作法。为了支持群众运动，迅速夺取领导权，制止坏人坏事，运动开始时，对原有组织中的干部，根据情节，分别采取集中整风、集训、特别集训以及停职反省、撤职反省、撤职查办、管教反省、逮捕法办等办法，进行初步处理。随着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深入发展和斗争的胜利，再根据群众要求，情节轻重，分别依法惩处和给予党纪、行政处分，进行最后处理。在处理中，要正确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既不漏掉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但对运动中发现的现行犯，应当坚决及时处理。另外在原有组织中，有一批好人受到打击，必须实事求是的予以平反。平反工作应当先易后难，对于问题明显，界限清楚，肯定是被打击陷害的应当及时平反，重新起用；对情节复杂，界限一时不易划清的，应当随着运动的发展，查清情况逐步平反。为了作好组织处理工作，应当加强审查批准机构，采取专门机构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把材料及时查对清楚，并要适当的简化手续，又快又好的处理各种案件。同时要迅速整顿各级政法部门的机构，发挥其在运动中的作用。

六、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首先是把县、社两级的“司令部”建立健全起来，主要是县委书记处和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应该迅速调配干部充实起来，加强集体领导，担负起领导整风和各项工作的重任。对于已经烂掉和基本烂掉的县委和公社党委，要进行改组，成立领导小组，把领导权夺过来。同时必须改组和健全“参谋部”，把整风办公室充实起来。整风办公室人员，必须是纯洁的，和坏人没有联系的人参加。其次是组织

整风工作队。一方面要把省、地、县工作组统一组织、统一领导，能够参加当地领导小组和党委的干部，都吸收参加当地领导小组和党委，使他们有职有权，便于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工作队的作用。工作队必须树立良好的作风实行“四同”，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认真学习党的指示、政策，坚决按照党的政策规定办事。要严格遵守纪律，与那些坏干部、坏作风明显的区别开来。同时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不断的整顿工作队，总结经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使工作队能具有高度的思想觉悟，良好的工作作风，明确的政策思想，能够坚持民主革命补课的斗争任务。

七、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要密切结合起来，一手抓整风，一手抓生产救灾和生活安排。运动的实践证明，不开展整风运动，不把领导权夺过来，坏人继续进行破坏，群众顾虑重重，情绪不安，社会秩序出现某种程度混乱的情况下，就不可能作好生产救灾工作，也不可能安排好群众生活。同时，不大力进行生产救灾，不认真地安排好群众生活，社员的吃饭、穿衣、住房、治病以及牲畜缺草喂养，修补旧舍等问题不加以妥善解决，就不能使群众安下心来进行整风，也必然影响整风运动的开展。因此在指导思想，必须把整风和生产救灾作为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的政治和经济上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既要集中主要精力开展整风运动，又要大力组织群众经济生活，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地、县、社各级，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统一组织和适用各方面的力量，全力作好整风和生产救灾工作。公社以下，领导小组和工作队，社员代表会、代表小组，都必须一边抓整风一边抓生产救灾，把两件工作同时作好，保证民主革命补课的彻底胜利，作好保人保畜和冬季生产工作，争取明年的农业大丰收。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0:07

(三)

根据我区当前运动进展的情况，必须继续深入地贯彻执行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掀起更大的整风高潮，切实做好生产救灾和生活安排工作，迅速扭转局面，保证人畜安全过冬，搞好冬季生产，为争取明年农业大丰收作好准备。当前要作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在全区范围内，迅速掀起整风运动高潮，彻底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彻底反掉“五风”。我区当前敌我矛盾是主要的，而且是突出的、尖锐的。必须首先打倒敌人，夺取领导权，完成民主革命补课的任务，不然，不仅党的方针、政策贯彻不下去，而且一切工作都无法作好。在打击敌人的同时，要普遍宣传贯彻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对于“五风”问题，凡是能够解决的都要尽快的结合解决。这样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孤立敌人。民主革命补课胜利之后，就要迅速转向反“五风”斗争，在斗争中，还应继续挖掘更隐蔽的敌人。要求在春节以前基本上完成民主革命补课任务，春节以后要用革命的精神，大反“五风”，力争于明年五月底以前完成反“五风”的任务，按照中央十二条紧急指示的要求，把公社整顿建设好。在每个革命任务完成之后，都要进行一次复查，真正搞深搞透搞彻底。民主革命补课彻底的标准

是：

(1) 坏人坏事被彻底打倒；

(2) 查清漏网的地、富，消灭封建残余；

(3) 夺回五权（党权、政权、兵权、财权、吃饭权），巩固地确立贫农、下中农的领导优势；

(4) 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苦水倒净，冤气出完；

(5) 扎正根子，培养出一批新的积极分子。二、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必须点面结合，在搞好重点的同时，必须加强面的控制。要求在十二月底，最迟明年元月上旬，把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的领导权全部夺取过来，普遍建立起以贫雇农、下中农为核心的大队社员代表会和生产队代表小组。对于坏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都要按照规定，进行集中整风、集训和特别集训，以便迅速扭转局面，制止敌人破坏。同时，要搞好重点，深入发动群众，分期分批地完成民主革命补课任务。

三、积极培养训练干部，壮大革命力量。目前普遍感到任务大，干部力量不足，各县都向地委要人。我们打算从四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1) 中央、省委已经给我们派来了大批干部，这是我们做好整风和一切工作的骨干；

(2) 积极培养提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充实社、队的领导。培养的方法，一是办短期训练班，二是吸收参加整风工作队，三是选为代表，担任实职，从实际工作中锻炼提高；

(3) 抓紧进行地、县、社机关整风，把原来的干部面貌迅速澄清，把真正的好人和犯一般错误而又愿意改正的干部很快解放出来，充实整风队伍，让他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锻炼提高；

(4) 对过去确实被打击陷害的好人，进行平反，分配给他们工作。采用以上四种办法，尽快地组成一支干部队伍，同时要结合运动，不断整顿队伍，纯洁组织，壮大新生力量，提高队伍的战斗力，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以适应当前革命形势的需要。

四、切实搞好生产救灾和社员生活安排，大力开展生产自救运动，保证人畜安全过冬。目前粮食征购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必须迅速搞好粮食定销工作，加强粮食管理，解决烧柴、吃菜问题，办好公共食堂。继续解决灾区人民缺衣、缺被、住房和疾病治疗等问题，扎扎实实地安排好群众生活。对于城市职工和群众的生活问题也要十分重视，抓紧抓好。同时要有计划、有领导地组织初级市场，活跃集市贸易和城乡经济，增加公社和社员的收入。还要加强麦田管理，大量积肥、追肥，力争明年麦季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中共信阳地委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0:14

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委“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等对信阳问题批示的文件”的批语》

—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河南省委1961年1月3日文件一件，供你们参考。希望你们注意分别第一、第二类县、社、队和第三类县、社、队的不同情况，随时总结经验，予以指导，而把注意的重点放在第三类县、社、队方面。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2]数日前已发给你们参考，谅已收到。

中央

1961年1月5日

二

刘、邓、彭[3]阅，尚昆[4]办，同时印发到会[5]各同志。

毛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0:27

中共中央:《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的批示》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一）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有分析，有办法，有步骤。现在转发给你们，要好好认真读几遍，好好研究几遍。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

（二）事实告诉我们，对第三类的社，队只要领导上头脑清醒，认真宣传和执行党中央的政策，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尤其是要信任和依靠贫雇农和下中农，敢于揭露情况，就能够迅速掀起整风整社的高潮，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彻底反掉“五风”，完全扭转三类社的局面，巩固地重新建立党的领导。

（三）生产队成立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对一切的社、队、都有普遍的意义。中央建议一切公社和生产队都应成立这样的代表会。公社一级的代表会，应该是由生产队社员选出的代表组成。具体办法可根据各地不同情况办理。

（四）在一切社、队，都必须一边抓整风社。一边抓生产救灾，一边抓群众生活，这三件事，必须同时结合起来，同时做好。

中 央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0:36

关于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等人员初步处理和安排意见的请示

中共信阳地委

省委:

我区整风整社运动，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自去年九、十月份后在个区范围内开展，运动初期，为了扫除运动障碍，迅速发动群众，彻底揭开盖子，澄清问题，经省委批准，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石富荣。原信阳专署副专员王子祯、潘幼耕等六人予以停职反省；给予孟定功（西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遂平县委第一书记）以停职反省；给予弓治英（平舆县委第一书记）赵勋远（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以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并且把集中起来，进行整风学习，在几个月来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斗争和对材料进行初步查对的结果，证实他们在前冬去春“信阳事件”中均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或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他们所犯的错误性质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运动中一般地都作了检查交待，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据此，经地委常委会研究，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

理从宽；坚持错误从严，检讨改正从宽”的原则给予初步处理，先让他们到基层工作，待问题彻底查清后，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我们初步处理和安排的意见是：

王达夫，原信阳地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在“信阳事件”中，他完全了解全区情况，没有对路宪文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一意孤行，在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大量死人的情况下，还错误的批转了一些反瞒产报告，并亲自总结所谓反“瞒产”经验在全区推广；在群众外出逃生时，还绝人生路，亲自批捕群众 335 人。另外，他作风十分粗暴，每逢作报告对干部无根据的点名批判，有时张冠李戴，挫伤干部积极性。在组织路线上，包庇重用坏人，应划为死官僚主义份子。虽有上述严重错误，但是在某些问题方面和路宪文并不完全一致；“信阳事件”盖子揭开后，积极揭发，检讨错误，有悔改表现，态度比较老实。根据上述情况，先让其到公社工作。继续查清他的问题，我们意见待最后查清后，将来撤消其地委书记处书记职务。

延炳玉，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农业），1958 年积极搞包工包产到户并亲自批转这方面的文件，企图在全区推广。当他的右倾错误被李瑞英同志（专区妇联主任）揭发后，为了掩盖错误，借 1959 年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机会，划李瑞英同志为严重右倾，撤消了李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打击了李瑞英同志；1960 年他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正是人口大量死亡、食堂停伙、问题最严重的时刻，他不但不向省委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同路宪文一道隐瞒错误，假报材料，欺骗上级检查；“信阳事件”揭发后，指使原农工部同志以地委名义发通知让各县、市退回并烧掉包工包产到户的所有文件，企图毁灭证据（由于地委办公室同志拒绝，未成事实）。在停职反省中，态度仍不老实，推脱责任，对自己错误认识很不深刻。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的意见先让其下去工作，待材料查清后给予一定处分，调外区工作。

武建华，原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党群政法），在“信阳事件”中，他也没有对路宪文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因而，也有责任。在干部工作上，不顾党的“德才兼备”的政策，提出：出身历史不好，只要现在积极可以提拔；不论品德如何，只要能说会写就要提拔；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大胆提拔；贪污 100 元以下，有男女关系影响不大的、打人偶然的等都不算不够质量，等等。在组织工作上，违背党的阶级路线，提出：历史问题不能瞎怀疑；有问题发现以后他本人负责等。由于他严重的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造成信阳地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另外他和路宪文同策共谋，指使政法部门制订了向人民专政的“八项规定”，使全区无数群众遭受残害，他亲自批捕的就有 180 多人。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能够检查认识错误，态度比较好，而且，他主持地委书记处的工作时间很短，责任较小，因此，先让他下去工作，到基层锻炼一年，还可以保留地委书记处书记。

石富荣，原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工业），他历史上于 1938 年、1941 年因环境恶化、生活艰苦，曾先后两次脱党。道德品质很坏，生活堕落，历史上因贪污、搞女人，受留党察看处分，而前冬去春又和保姆发生两性关系，影响极坏；在工作上，一贯严重浮夸，弄虚作假，积极主张“要钢铁不要一切”，平调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严重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同时，为了配合路宪文在农村反瞒产运动，前冬去春在全区厂矿、交通运输企业中开展了批判斗争，不少干部、工人被打和罚劳役。“信阳事件”揭发后，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散布“对路宪文处理太重了，信阳不是反革命复辟”等论调。对自己的错误则检查很不深刻。因此，地委认为原来提拔该同志作地委书记处书记就不够称职，现在可以先让下去工作，待问题查清后，再作最后处理。

王子祯，原信阳专署副专员，作风恶劣，行政命令十分突出，工作上、生活上稍有不顺他意，就斥责为“无用”、“混蛋”。因而，很多干部都不敢和他接近，严重脱离群众；在工作上，他分工管工业、基建，打着抗旱旗号，向省要物资，长期扣押不报，在基本建设上，没有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设方针，而是错误的另搞一套，违背了中央的正确指示。停职反省后，对自己所犯错误作了检查交待，有了初步认识，但对于“信阳事件”的性质和自己所负的责任认识很差。因此，保留副专员，需下放到基层单位锻炼一年。

潘幼耕，原信阳专署副专员，生活上腐化堕落，1953年因强奸妇女，受到党政纪律处分。在近两年内，又和三青团员、右派份子的老婆柳凤兰搞男女关系，并提她为党委干事，还企图诱奸托儿所保育员。在任专署粮食局长时，严重破坏国家粮食政策，利用职权，克扣职工口粮，多吃多占，贪污浪费，长期养活五个无户口又无粮食关系的亲属。据已查实的共计贪污职工口粮2848斤，多吃多占、贪污浪费折款1500多元，在粮食工作上，一贯叫喊农村有黑仓库，加大征购任务，在农村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之时，还扣押统销指标，迟迟不发。明明知道下边无粮食，不但不向上级反映，反而阻止别人向上级要粮食，情节十分恶劣。停职反省中，对自己错误没有深刻认识，推脱责任。据此，地委认为待材料查清后，撤消其副专员职务，现在可先让其到基层工作。

孟定功，原西平县委第一书记，在“信阳事件”中，积极地执行了路宪文反动的方针路线，加派征购任务，断绝群众粮食，并且带头违法乱纪，使全县饿死9792人，逼死1742人，打死748人。对于这样严重的情况，不但对上级封锁，而在运动初期还蒙蔽欺骗，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思想糊涂，工作不实际，作风不艰苦，认为还是较其它县死人为少。在西平问题揭发后，作了检查交待，对自己的错误表示十分痛心，愿意立功赎罪，为党继续工作。据此，瓜任西平县委第二书记。

蔡中田，原遂平县委第一书记，在前冬去春“信阳事件”中，提出：“下狠心，下毒手”的口号向群众威逼要粮，对一些公社党委克扣群众口粮的错误作法，不但不制止，还大力表扬赞许，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同时在生活上也大吃大喝。但是对于遂平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恶果应由赵光（地委常委委员，下放遂平县任副书记）负主要责任，同时蔡中田在情况紧张的时刻，下拨了粮食，制止了干部收小锅，向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斗争，办了一些好事，加之对自己的错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态度较好。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

弓治英，原平舆县委第一书记，前冬去春错误的分析形势，严重浮夸。写了“郭庄大队闹粮问题真相大白”的反瞒产报告，地委推广了这一报告，在全区发生了极坏的作用，对于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党员、好干部，则进行打击迫害，不正确地处理了一部份同志。在新蔡和平舆工作期间都犯有比较严重错误，造下了恶果。同时生活上大吃大喝。但是，他是全区向地委要粮最早的县，同时，在平时工作中，一贯表现尚好，这次管教反省期间，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态度比较老实，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平舆县委书记处书记。

赵勋远，原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与前任第一书记梁德柱共谋策划，积极进行“反瞒产”活动，并以国家拨给群众口粮作挖出的漏洞粮食向省、地委报喜，亲自住社搞“重点”，致死致残大批群众。在潢川问题被揭发后，还封锁消息，抗拒检查，亲自给各公社布置不准向上级

反映真实情况。但是鉴于潢川县前任第一书记梁德柱一直没有离开，前冬今春又是梁亲自指挥。所以潢川县的问题，赵勋远不负主要责任。在管教反省期间，检查认识错误较深刻，态度较好。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

对于以上几个同志，我们意见暂时均可叫他们先下去工作，待问题查清后，再作最后处理，可否，请省委批示。

中共信阳地委
1961年4月29日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0:47

附:

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

中共信阳地委

路宪文，男，41岁，山西省陵川县人。出身，学生成份。1937年9月参加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历任县“牺盟会”协助员、县委宣传部长、分区武工队副政委、县长、县委书记、副专员、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等职。

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凄凉。这一残酷事件虽然说是“五风”错误、执行左倾盲干有极大关系，上级应负很大责任，但是，路宪文身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应该负直接的重大的责任。其具体罪恶事实如下：

一、1959年10月，全区就发现有粮食征购透底、食堂停伙现象，部分地区已开始死人。路对这一严重情况不但不加正视，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反而继续开展所谓反瞒产斗争，支持弄虚作假，纵容违法乱纪，推广假现场会的经验，批判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在路的这种极端错误的指示下，于11月份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发生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1959年10月下旬，路派原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工作组到鸡公山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整党、整社重点。王去后即发现全社闹粮情况较普遍，谢桥等大队从国庆节开始即断粮停炊，11月初发生肿病死人。王于11月8日、15日两次向路汇报了这一严重情况，并要求解决粮食问题。但是，路两次都拒绝给粮，并且批评王秉林同志思想右倾，工作不深入，叫工作组“硬顶”，并说：“要和群众实行‘三同’，群众三天不吃，你们也三天不吃，看他们拿粮不拿？”

要工作组“坚决突开”，一定要搞出粮食来。16日工作组执行路的“硬顶”指示，到19日已顶不下去，死人情况急剧发展，谢桥大队即死二十多人。12月初因鸡公山还未突开，路便让信阳县委第一书记徐国梁同志亲自前去突开。徐国梁同志召开了鸡公山反瞒产搞出粮食的假现场会后，路就让王秉林同志两次给各县传播鸡公山反瞒产假现场会的经验。经验中强调要顶住“叫喊缺粮、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的现象，就是在反瞒产中干部要过“三关”，后来被原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发展为干部过“五关”（加造谣关和不生产关）。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路又让王秉林同志主持召开了十三个县六十六个公社，七百三十多人参加的反瞒产假现场会议。这就迫使全区在群众口粮极少的情况下，还大搞反瞒产，各县先后召开了假现场会474次，挤光了群众的口粮。

当群众因食堂停伙已开始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时候，路还推广了确山县所谓反瞒产万人大会的错误经验。1959年11月24日至26日确山召开了万人反瞒产大会，会上采取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办法，逼着干部群众报出粮食三千五百万斤。25日路到确山，26日听了原确山县委第一书记邵鲁明的汇报。邵向路汇报了号召交红心反对交黑心的经验（实际上是批判斗打），路听后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大加赞扬，要邵鲁明同志在电话会上介绍经验，积极向全区推广。于是全区各县相继召开了52次万人、双万人大会，到处斗、逼干部和群众，直到把全自动口粮挤光受净。

路还推广了原罗山县委第一书记、阶级异己分子许文波组织五类分子反瞒产、预备党员转正反瞒产的反动经验。1959年11月6日在地委召开的“突破落后，搞出粮食征购入库”的电话会议上，罗山县许文波汇报了五条经验，其中一条就是集中五类分子在县训练，以搞评比为名，让他们报队里瞒产私分粮食。路听后当即表扬了罗山的作法，并派专署粮食局长潘耕同志于11月7日到罗山召开了光山、潢川、正阳、息县、淮滨等五个所谓落后县的会议。让许文波在会上介绍了罗山集中五类分子反瞒产的经验，实际上是向农民进行阶级报复。11月9日潘幼耕同志回信阳把这些情况一一向路作了汇报，路虽提出集中五类分子搞粮，不能让五类分子搞干部的意见，但实际上仍然同意和推广了这个组织五类分子向群众逼粮（实际上也搞了干部），对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的经验。1962年5月26日路宪文自己检讨说：“开五类分子会议反瞒产是一种反动的作法。我不加警惕的推广了这一经验，说明我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当时我的思想上视粮食为珠宝，只要搞了粮食就能解决问题，发展到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的严重程度”。这以后，正阳集中五类分子944人，潢川集中五类分子700多人准备反瞒产，后被河南省公安厅发觉后制止，所以，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如上所述，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搞反瞒产，以致挤光群众口粮，食堂停伙，这是造成信阳地区人口大量死亡的直接原因。

二、信阳地区在反右倾和反瞒产斗争中，违法乱纪现象非常严重，摧残农民的手段，实难容忍，好多农民被打残直至被活活打死。路宪文1959年9月在省三级干部会上亲自主持小组会斗争推才翁平舆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曹铭同志，是1959年冬1960年春全区发生严重违法乱纪现象的开端。当时，平舆县征购任务没有完成，路认为是曹存在有右倾思想的结果，让曹参加省三级干部反右倾会议，反曹的右倾。开始小组会斗争曹铭时，大家准备发言提纲，采取说理斗争的形式。但路认为不紧张，即专门向大家动员说：“这样斗争不严肃不紧张，不象个斗争样子”。这以后，斗争会就出现了一哄而上、拍桌子，向曹指手划脚的情况。9月14日下午，路亲自主持小组会，曹检讨，大家认为交代不好，当时有潢川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

汝南县委第一书记付良太、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等人一哄而上你推我翁（应为才翁，下同——编者），梁德柱还打了曹一下，马龙山按曹的头，有人还抽走曹的椅子，罚曹站着，发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路对这种违法乱纪现象不仅不严加制止，反而拍着桌子逼曹交代。16日晚有人说曹翻案，大家在河南饭店走廊里斗争起来，又推翁一阵。路坐在门口也不加制止。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路隐瞒真实情况，没有向省委报告，在路的影响下，上行下效，全区在反右倾和的反瞒产中，普遍发生了打人等违法乱纪现象。路对全区所发生这样普遍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仍然未加严肃制止，反而强调要保护干部积极性，不要单纯批评干部，并说：“群众运动总是要死些人的”。同年12月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念仲，为了掩盖吃人肉的真相，叫公安局长王志刚故意强逼群众吃人肉，造成惨案，1960年元月1日，在潢川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作了汇报，路也未表示态度。由于路对违法乱纪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因此，全区在反瞒产和反右倾中几乎逢会必斗，逢斗必打，打人成风，竟成合法。阶级异己分子、反、坏分子更乘机阶级报复，残害群众。据统计，全区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打害群众的酷刑在几十种以上，如吊梁、跪砖、砸牙、剪耳朵、刺手、缝嘴、火烧、铁烙、火葬、活埋等等，真是残忍毒辣，骇人听闻。原光山县委第一书记、蜕化变质分子马龙山就在这种情况下，活活打死了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同志。路对张福洪的死，没认真查处，使这一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0:56

三、信阳地区开始死人和以后大量死人的时候，路不仅听到过食堂停伙、人口外流、肿病死等严重情况的汇报，而且在其下乡时，也亲眼见过。但是，路见死不救，继续坚持所谓反瞒产斗争，实际上是置农民于死地，还说是敌人破坏，富农叫嚣，以致死人情况越发不能遏止，起了落井下石，火上加油的作用。1959年11月22日路到息县包信公社，在南边街上看到一个死人，死者腿和肚子肿的。当时在场的群众对路说：“死者是徐楼的，食堂已半月未开伙，外流和死的人很多。”路听后（应加叫——编者）随同去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安廷堂把说话的人带到公社，那人害怕便半路逃跑了，而路说：“那个群众吃得肥胖，可能是富裕中农造谣，挑拨党群关系。”11月28日，路坐汽车到信阳市明港，汽车坏了，停车修理时，一个妇女引一个小孩面黄肌瘦，向路要钱、要粮票，并向路哀求说：“可怜可怜我们母子吧！救救俺孩子吧！”路不仅不可怜她母子，尽力救人，反而对她说：“不要在外乱跑，回家去。”12月2日，路从潢川回信阳，当时有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同车回光山。车过付店西边，见公路北边有两人拉一死尸，车未停便走了。到光山寨河马龙山下车，看到有很多外流群众，有的拥向车来，想拦车，马龙山正下车回光山，路就叫马去问问他们要干什么，自己坐车走了。出寨河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纪20多岁的妇女，抱着一个小孩，看见路的汽车，把小孩放在大路上，自己双腿跪下，叩头要饭吃，路一声不吭，车未停就走了。到光山孙铁铺，又见到路边食堂附近有外流群众吵吵闹闹要买饭吃。到罗山竹杆河，有三个妇女挡车要钱，有些人要坐车，路硬叫司机开车，司机就向拦车群众说：“你们让开，我把车开到路边，你们好上车。”当群众一让路，车就开跑了，群众在背后大骂。车开出不远，又看到路边稻田里有两三具尸体，有一个没衣服，头发长长的，身体肿的，路仍无动于衷驱车而去。

到罗山县委，路为了掩盖问题的真相，对原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提出三条意见：一是赶快派人把路旁的尸体埋掉；二是把信潢公路两边的食堂生活安排好，因为信潢公路来往旅客多，安排不好影响大；三是收容外流，先管饭吃（当时下边实际没有粮）。并叫安廷堂同志把这三条意见，打电话告诉光山、潢川县委。还叫对光山说，把孙铁铺街上的食堂迁到背街去，在公路边挤着买饭吃影响不好。12月3日路回信阳，在地常委会上还宣扬司机如何机灵地躲开外流群众拦车，对见到的死人，说成是敌人破坏，未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难怪当时群众反映“听到包车响，一定有指望，眼看包车走，活命也难逃。”这就是说，群众对原信阳地区领导上的最后一丝求救活命希望，也断绝了。

至于在会议上，县社干部汇报浮肿病死人的情况，路更置若罔闻。1959年11月17日在潢川召开淮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会上淮滨汇报刘群大队群众已有六天光吃菜，赵集铁路营子队因吃菜外逃五十三人。商城汇报达权店白权铺队已有十六天不烧锅，观音山、峡口等大队因停伙疫情严重，发生死人情况。罗山汇报北徐大队六个食堂停伙。潢川商城等县汇报有的群众把小孩丢在县委、公社、托儿所门口。潢川梁德柱还汇报，有的群众把小孩放在柴禾里去卖等等。路对此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并不引起同情，反而武断地说：“私分瞒产较普遍，特别是落后地区，几乎社社有，队队有。”提出要以“核实产量，安排生活”为名继续搞反瞒产。12月1日光山马龙山向路汇报了当时全县有四百一十五个食堂停伙，九百一十四人外流，丢小孩三百四十八个，并有吃人肉的情况。路当时说：“吃人肉、丢小孩是敌人破坏。”12月29日，路去罗山，县里正在开扩干会议，路听了汇报。彭新公社党委书记当时汇报，该公社从十月到12日（应为月——编者）死亡三百六十人；定远公社汇报，十月以来死四百余人；竹杆公社汇报十月以来死一千七百余，周店大队一夜死了20多人，大塘大队河口小队26户死29人。但路对病人、死人原因，竟说成是：“夏季大旱，血气运转不周，天冷血紧缩了，加上吃的不清洁，生活安排不好，促进了生病的发展。”1960年元月12日路在汝南召开淮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会上新蔡汇报，外流一千多人，于庄公社宋寨队已死30余人；正阳汇报，李堰大队二千多人死了三百多人，路对死人问题没有表示态度。

四、1959年冬至1960年春，信阳地区群众处在口粮征光，蔬菜吃尽，被逼得丢儿弃女，破产逃荒，杀吃耕牛，甚至吃死人肉充饥的悲惨的境地。路对此诬之为“富裕农民进攻”，“敌人破坏”，并对群众采用专政的手段，实行镇压。

丢小孩问题，如前所述，在几次会议上都有汇报。1960年元月10日在潢川召开第二次淮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上，也有汇报，但路则说“丢小孩问题，有的是小孩他父母教给他说父母饿死了，等等，这明显是敌人的破坏”，以致各县对丢小孩的事件，不仅不加正视，凡而用各种办法打击群众，致使大量被遗弃的小孩冻饿致死。

1959年11月群众因没饭吃，无奈而杀牛充饥的事情已经陆续发生。路则在一次地委常委会上。向原公安处副处长韩仁秉布置说：“凡杀牛不管是谁，不管杀的大牛小牛，一律法办”。韩按照路的指示通知各县执行，以致全区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五月共逮捕因饥饿而杀牛保命的所谓“杀牛犯”2053人，死于狱中454人。对待被迫外逃的群众，也同样采取了专政的手段。路布置公安部门组织民兵巡逻，收容送回，不准外流。1959年12月6日，路在各县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上虽然也说外流有些是属于生活问题；但强调有些外流是“属于地富反坏右……趁逃荒为名到处破坏、造谣制造案件；特别强调有些外流是富裕中农因为隐瞒产量很多，怕斗争而外逃出来了”。因此他布置各县：“必须坚决消灭外流。政法部门要深入到各乡、各大队调查地富反坏右、富裕中农外流到底有多少？……查出搞回来后揭发他们的

破坏活动，开展斗争，斗后管制而不准外逃”。当夜路又在各县公安局长会议上指示：“消灭外流问题，在最近两三天一定坚决搞好。特别是信阳地区要开几个现场会，明天中央地质部专家和苏联专家要来固始查矿。组织民兵搞好这一件事，搞不好不行”。平时，路还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没好人”。在这种错误的、反动的思想指导下，各县到处组织民兵设立岗卡，拦路扣留、搜查群众，全区从1959年十月到1960年5月共收留了46万人次，其中在扣留期间冻饿致死一万余人。路宪文于1962年5月26日检讨说：“我这种对待外流群众的错误分析和极端错误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违法乱纪行为。群众外逃求生我把他当作坏人，不准外流更堵塞了群众的求生之路，这完全是一种国民党对待群众的办法”。

当时，群众一无口粮，二无蔬菜，三不能逃荒，四不能杀牛充饥，以致逼得人吃人肉。这样悲惨的事情，路还说是“敌人破坏尸体”，并亲自批准逮捕了吃人肉的群众，如罗富学，贫农，才十五岁，信阳五里店人，1959年12月父母饿死治留下四岁的小妹妹，无衣无食，罗在饿急的情况下，将其亲妹妹杀死吃肉，这本来很明显不是什么敌人破坏，相反是悲惨难忍的事情，但路竟亲自批准逮捕判刑十五年。又如1960年元月路在光山马畈公社，利用职权擅自口头批准逮捕吃人肉的周曾大队社员张建华、土门大队社员闵世千、凉亭大队社员杨耀中等三人（均系贫农）。捕后，闵张二人死于狱中。路对于这两件冤狱事件，应负直接的责任。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1:08

五、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大惨案，在省委未追查之前，路在此前后从未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而采取掩盖真相，封锁消息，违抗检查的错误行为，使这一惨案持续半年之久。

1960年元月12日，路从息县出发经新蔡、平舆到汝南开会，看到沿路有些榆树树皮被群众剥吃了，路到新蔡、平舆停车时叫新蔡县委书记处书记巨庆彦同志、平兴县委第一书记弓治英同志赶快通知下边把剥了皮的榆树砍掉。1960年2月，路从省开会回来经过信阳县长台关车站，见到淮河南边铁路两旁，有的树皮被剥光。路就叫信阳县委书记处书记余伴勤同志派人检查，把树砍掉。1960年春，路和省委书记处书记从新县到光山，经过泼河南边的张傲，见有倒塌的房子。到光山，一见马龙山便说：“你们那里的坏房子不扒掉放在那里展览吗？”马龙山随即通知把坏房子扒掉了。1959年12月2日，路从潢川回信阳的路上见到死尸，他指示潢川、光山、罗山三县立即加以掩埋。

路对死人数字更采取了报少不报多的隐瞒态度。1960年元月，公安处韩仁秉根据各县公安局统计向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同志汇报，1959年死人23万，其中浮肿病死八万人。王叫公安处弄清情况后再报（实际上是不同意报这个死人数字），路同意王的意见，让重新统计十九万人后，才上报省公安厅。1960年4月，省委催要信阳地区死人情况，路在给省委的书面报告中，只报11月以来（信阳地区大量死人就是集中在这一段时间），“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瘤病和其他疫病累计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1960年元月11日，在潢川召开的淮南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上，固始杨守绩向路说了死人数字，路说：“死人数字要进一步核实，不要犯扩大化的错误，你们应把他们分开说明，有正常死的，有病死的，有些老年人死是难免的。”1960年2月省五级干部会议上，杨守绩向路汇报固始死两万多人，路说：“会有那么

多？再审查一下划划界限。”1960年元月，省委派工作组了解生活安排情况，发现死人并加检查。在检查潢川县死人问题时，梁德柱同志采取抗拒态度，曾说过“省里来的不知是否党团员，不能给他们说死人数字。”元月11日，路在潢川听梁说这话后，当着马龙山、杨守绩等人面前，支持梁的说法，并说“省里来的不知是否党团员，给他们说有什么好处？”省工作组张富同志，对梁德柱抗拒检查很有意见。路不但不批评梁山，反说“张富同志态度不好。”省工作组陈志骅同志（省粮食厅处长）检查发现鸡公山现场会是假的，而且那里肿病死人严重，向原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同志作了汇报，王向路说后，路竟说“陈有情绪，思想右倾。”1960年春，中央监委李坚同志检查信阳地区死人问题，路曾散布不满情绪。李坚同志临走前，找路交换意见，路借口没时间，拒绝不谈。

1960年5、6月间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时，有一天夜里路把梁德柱同志和马龙山留下，问死人情况。梁说：“潢川没死那么多（当时说死人五万五千人），这是省检查组，从原来人口减掉现有人口得出来的，原来人口也有虚假”，路即对梁、马说“你们再搞一下，不叫省检查组知道，咱心里也要有个底”。更严重的是路还压制民主，非法追查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光山县白雀公社民校教师李玉伦，匿名向信阳地委写信，反映群众生活问题，批评路对农村情况的分析不切实。路曾指令马龙山和白雀公社书记黄文儒，追查写信人，经查档案1650份，对笔记（应为迹——编者）六千多份，结果查出来是李玉伦，将李扣押二十多天。专署建筑工程局党员干部邢贵良同志，匿名向中央、省委反映信阳地区外流、死亡情况。路指示公安处侦查破案，查出来，对邢进行了批判斗争，并督促该局将邢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因信阳问题盖子揭开，未遂）。

路宪文对待其所犯错误和罪恶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信阳地区死人问题，先后经中央、省委八次检查，以及有关负责同志耐心教育帮助，但仍未彻底底检查。省委宣布将其“撤职查办，管教反省”时，仍不老实认罪，彻底悔改。直到经过群众揭发斗争，在大量事实面前才低头认罪，初步作了检讨。

路宪文所以犯上述严重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路长期以来，存在有名誉、地位思想，特别是1958年以来，骄傲自满情绪比较突出，虚报浮夸，弄虚作假，谎报成绩，骗取荣誉，甚至不择手段，纵容违法乱纪，利用五类分子搞反瞒产来完成征购任务；直至发现群众生活有严重问题，大量肿病死人的时候，仍念念不忘其名利地位，怕否定自己谎报的成绩，怕失去骗得的荣誉，怕揭露自己的错误，以致在12月底，省委指示拨粮以前，见死不救，不准群众外流逃荒，不准群众杀牛充饥，断绝群众一切生路，置群众于死地；惨案暴露后，又扒房砍树，掩埋尸体，追查写信反映情况的人，掩盖罪行，封锁消息，甚至对中央、省委的检查采取逃避和对抗的态度。所有这些事实，证明，路宪文已经从骄傲自满、贪名利、图荣誉的严重个人主义，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叛变无产阶级立场，堕落成为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在信阳地区犯下了严重罪行。但考虑路在参加工作后，在党的领导下还作了不少工作，且在1959年12月底以后，还执行了省委的一些指示，向下拨了一些粮食；1960年春第二次下乡时，见到路上浮肿病人也进行了一些抢救治疗工作。最近期间，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表示愿意检讨，低头认罪，还有回头之意。经地委常委于1962年7月6日研究决定，给予路宪文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建议政府判处适当徒刑，以平民愤。

中共信阳地委

1962年7月10日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1:16

回帖人: 帅老头 影响力指数: 2 | | 发短消息 | 只看此人 | 2011/4/24 21:14:00

跟帖回复: 第 183 楼. 京客兄: 薪火传递!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这是所有知识分子良知的彰显和传递! 在你的身后不是孤单的, 而是一个群体。你们点燃的薪火不会熄灭, 只会燃烧得越来越旺!

.

+++++

啊哈, 老人家, 好久不见, 祝福您福瑞无疆!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1:27

清江盈月是毛清江吗? 读过清江兄不少好文章!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1:37

附件 2: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3)
豫法刑一字第 15 号

公诉人: 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曾焜

被告人: 路宪文, 男, 现年 43 岁, 富农出身, 学生成份, 汉族, 山西省陵川县人。1937 年参加工作, 同年 12 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已开除党籍)。在任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期间, 于 1959 年冬至 1960 年春, 因犯渎职罪 1960 年 11 月 16 日依法逮捕。无前科。

被告渎职一案, 已由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现在业经审理终结。查明:

被告路宪文, 不关心群众疾苦, 不管群众死活, 明知 1959 年信阳地区灾情严重, 在粮食征购期间, 有些县、社反映任务大完不成, 被告置之不理, 反而又过高的加派了任务, 大大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 当时不少县委将这种情况向路宪文作过汇报, 被告到各地检查工作时, 也亲自看到这些现象, 对这种情况不仅不采取措施, 反而武断的说是“富裕农民抵抗征购”和“敌人破坏征购”, 硬叫各县坚决完成任务。并推广了反瞒产斗争的错误经验, 这就严

重的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征购政策，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损失。

被告路宪文，当灾情严重，群众生活困难，面临饥饿，不得不外出谋生和宰杀牛羊渡荒的时候，路宪文对这种情况，不但不采取有效措施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反而对外出谋生的人一律称之为“流窜犯”说：“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把外流的农民说成是“地、富、反、坏份子破坏”，并布置公安机关消灭外流，打击流窜，设置岗卡，强制收容；对杀牛渡荒的群众，一律称之为破坏生产的“杀牛犯”通知各地可以先斗后捕，形成了违法乱纪、乱捕乱押，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被告路宪文，为了隐瞒罪恶，打击陷害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人。有些人对路宪文的严重错误表示不满，向上级写信反映真实情况，被告路宪文知道以后，不但不认真检查改正错误，反而利用职权，打击陷害好人。如光山县李玉伦、信阳县胡修玉、信阳专署建筑工程局邢贵良等同志，先后署名向中央、省委和地委反映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路宪文知道后，反而指示有关部门给以非法斗争，结果将李玉伦查出扣押 20 余天，胡修玉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斗争后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邢贵良斗争后开除党籍。

本院认为：被告路宪文的上述罪行，不仅严重地违犯了党纪国法，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已构成渎职罪。本应依法从严惩处，但念其在管押期间，尚能坦白认罪，愿意悔改，因此，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政策精神，按渎职罪从轻处理，特判决如下：

判处被告路宪文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 1960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1963 年 11 月 15 日止）。

1963 年 9 月 13 日作成。

如不服从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限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 王光力

人民陪审员 王之敬

李 智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章）

公元 1963 年 9 月 13 日

书记员 黄坤华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1:58

我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检讨

原中共信阳地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信阳地区行署专员 王达夫

我以十分严重的心情来检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我坚决拥护中央、中南局和省委对信阳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坚决拥护省委、地委对我的停职反省决定。我完全接受广大干部对我的错误事实揭发与批判。我十分感激地委和全党同志对我所采取的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我愉快的解释党给我的宽大处分决定。

关于我在信阳事件中的责任和主要错误事实检讨如下：

一、我在信阳事件中应负重大责任的。

信阳事件是一九五九年冬和1960年春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程度是十分凄惨的、痛心的，这是历史罕见的，这给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与恶果是不可估量的。（1）十分痛心的是葬送了大批阶级兄弟的宝贵生命，由于饿死、打死人的地区广、时间长、程度严重，不少公社、大队村庄，死亡人数占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比例；特别是许多村庄和许多户，成庄成户的死绝，致使死人无人埋、人食人现象的发生，造成老者无儿女，壮者无夫妇，幼者无父母。这种凄惨情况是目不忍睹的。难以忍视，忍目的，这一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2）由于事件严重不仅丧失了大批劳动力，而且也严重地摧残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在全区范围内的浮肿病、妇女闭经等各种疾病发生，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育。（3）在人民生活上，造成了严重灾难，房屋严重倒塌和失修，室内十有九空，生活资料损失也大，家底十分空虚，广大社员受缺吃缺穿缺住之苦。（4）生产元气遭受到严重破坏，由于天灾人祸（主要是人祸）严重，不仅丧失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大牲畜死亡也是严重的。各项生产资料大量的破坏。大部分的村边、路旁、树木和山林，砍伐净光。大量良田严重荒芜，这些生产元气的破坏和损失，没有三、五年或者十年难以恢复的，这不仅直接影响和破坏了生产元气，而且也严重的破坏国民经济基础，给今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和困难。（5）在政治上损失也是严重的。在政治上不仅破坏了三面红旗、工农联盟、干群关系和毛主席的威信，而且也严重的给阶级敌人利用自然灾害困难和工作中的错误，进行疯狂的破坏留下可乘之机，他们一时兴风作浪，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破坏社会主义事业。（6）在组织上，由于以路宪文为首的原地委常委严重的错误方针政策和错误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不仅原地委成了瘫痪，而且某些县、社、大队党的组织也成了瘫痪，甚至变了质，特别是一大批领导骨干迷失了方向，犯了严重错误，少数一直发展到蜕化变质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阶级的泥坑，其恶果是极大的，广大农村形势曾一度呈现，一片凄凉严重危机局面。这是我们在社会建设上打个大败仗，在阶级斗争上打个大败仗，也是在党的建设上打个大败仗，这一教训是十分严重的，深刻的，终生难忘的。

信阳地区在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〇年春的形势是十分严重危机的。信阳事件给党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和恶果，与以路宪文为首和我的错误政策和错误指导思想都有直接关系的。这一事件的政治责任除路宪文外，我应负重大责任，信阳事件造成程度如此严重时间如此长，地

区如此广，情况是十分凄惨的，信阳事件是以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把严重灾情当丰收，把实际问题当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特别是认为有敌人破坏，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全区广大群众处在严重饥饿情况下，而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如反瞒产、大扑杀牛和破尸体犯组织大收外流人员等）我在这些错误政策执行上，在某些问题与向路宪文提出不同意见，但路不接受之后，我不但没有坚持下去，反而积极的区执行路的一些错误措施（反瞒产、批准扑人、收外流人员），特别是发生重大死人情况时，没提到原地委常委专门讨论以制止死人，又没有积极提议或亲自报告省委，这一政治责任应由我来负的，如果我坚持原则，不支持与执行路宪文的错误方针政策，同时将死人问题交原地委常委会议讨论，采取断然措施，或报告省委让省委早知道信阳问题，信阳地区人民也不会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摧残，也不会拖延半年之久，仍然揭不开盖子。

我是信阳人，长期在信阳地区工作，我又是地委常务书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地委常委分工，我分工主持地委常务工作，省委未批示），因此信阳造成这一极为惨痛的死人事件，我是应负重大责任的。

二、我在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〇年春，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主要错误事实：

1、关于推广鸡公山假现场会议问题。鸡公山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安排群众生活中，搞出粮食七百万斤的经营报告（兑现三百万斤）在全区推广。实际上粮食是假的，造成恶果是极大的，这是应由我负重大责任的。鸡公山是地、县委整社重点，是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转入安排群众生活的，工作组除王秉林同志负责外，县委徐国梁也到该社去搞安排群众生活的重点，十二月上旬有一天路宪文在原地委常委办公室说：鸡公山已突开，地委召开个现场会（杨玉璞同志也在场）有教育意义，我没问怎样突开的，我认为鸡公山有粮食，我同意路宪文意见，开现场会的通知是我叫原地委办公室发的，在会议前鸡公山挖出的粮食的经验，分别在电话会议和县委农业书记会议上都作了介绍，县委会议未开前我曾叫地委办公室给鸡公山打电话，问粮食清点怎样？能不能开等，王秉林同志答复说：个别队有问题，大多数队没有问题，可以开。这样我才决心叫原地委办公室发开会通知（具体日期是十二月十七日）。会议中间，我叫办公室问下会议开的怎样？要求写个简报送地委，送来的简报主要反映会开的好，大家反映很解决问题，我阅后批语：没来参观的组织参观等。到会议末尾，听到炮校胡政委和地专直一个同志除反映好外，还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参观人员快上火车时一个老婆不叫走，提出大丰收就是没啥吃；二是参观某个队谷粳被人挤倒了发现是假的。我听了认为有问题，我又叫办公室通知停止参观，一是问下鸡公山公社这是怎么一回事？该社答复：有问题不很大。这样我又相信了，没有追根到底，直到一九六〇年元月上旬省委检查组汇报鸡公山生活安排不好，有停伙外流死人等问题，我听了后，认为问题很大，也觉得鸡公山搞出粮食有鬼了，叫办公室给鸡公山公社党委打电话，责问有问题为啥不向地委反映？应作检查（鸡公山党委和王秉林同志都作了检讨）。群众吃粮问题全部解决（从当时起直到接麦），鸡公山问题教训很大，恶果也是严重的。鸡公山发现问题很早，问题也很严重。如采取断然措施，鸡公山死人完全可以减少，反瞒产早会停止，全区死人问题会被正视，死人程度也会减轻；反之，而采取反瞒产假现场会等错误政策和错误措施，不仅给鸡公山造成了严重恶果和损失，也给全区造成严重恶果和损失。这个恶果是正当全区群众生活紧要关头，正需要解决粮食开伙吃饭等问题，我推广了鸡公山假现场会议这实际上是弄虚作假，混淆了是非，致使真假难辨，也是对人民等于落井下石，结果造成全区严重死人，这一损失应由我来负责的。

鸡公山假现场会的这个政治责任，应由我来负的，因为：（1）鸡公山经验不该推广，现场

会不该开，同时这样重大问题，没经原地常委讨论，事后发现问题只跟路宪文说说，又没有向原地常委汇报和讨论。（2）鸡公山发现问题很早，为啥不采取积极的断然措施，而采取错误政策和错误措施呢？开头认为鸡公山有粮食闹粮，停伙外流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情况，我这个观点跟路宪文是一致的。因此对有粮食是肯定的，对会前会中发现问题半信半疑，认为就是有问题也不是主流，而有粮食则是主流，坚持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当会后发现问题严重，只对鸡公山采取了措施，则对推广假现场会的危害和恶果没考虑，因而没有采取否定鸡公山现场会议停止推广接受这个教训，如果这样做，这个恶果的影响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我应负重大责任。（3）会前关于鸡公山搞出七百万斤粮食的经验向省委作了报告，会后发现是假的没向省委作专题检查报告，这是向省委不反映真实情况，事后发现问题，又没报告省委，是对省委隐瞒错误的严重行为。

2、外流人员和丢小孩的态度问题。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冬因缺粮而停伙外流、丢小孩、弃儿女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我在外流人员和丢小孩的态度上，是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但不同情，反而大肆批评别的同志的同情，我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完全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行为。在一九五九年初冬（十一月下旬或十二月上旬）我在地专直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形势的时候，举出外流人员、丢小孩统计数目和成分例子，指出外流人员原因很复杂，分为七种人：一是地富和富裕中农逃避斗争（那时正出整社高潮）；二是小商贩投机贩运；三是二流子懒汉怕劳动；四是敌人煽动的盲目外流；五是青年人不安农村劳动，想到城市找职业；六是农村生活安排的不好；七是流窜犯。这个分析与批判是错误的，特别是我在这个报告大会上还不指名的批判一个营业员、一个路警对外流人员和丢小孩同情流泪的问题，我很严厉的批判他们说：外流人员很复杂，啥人都有调查没有？为什么哭，啥立场等。我在报告中乱发言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行为；二是对外流人员情况分析与批判，没有阶级立场与观点，错误判断，歪曲事实真相，混淆了两类矛盾，把生活问题当思想问题，把富裕中农问题当敌我矛盾，把现象当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严重歪曲事实真相的；三是打击了好人，压制了民主，那时全区正处于严重食堂停伙断炊，人员外流，丢小孩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吃饭和生命重大问题，我不但不同情，反而还判断有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批判他们同情流泪，这正证明了他们立场稳，为人民外流、丢小孩同情流泪，我为啥不丢小孩，我为啥不调查，我为啥不同情流泪，反而还批判别人同情流泪是立场问题，我是个啥共产党员，是个啥领导，是个啥立场呢？这些言行充分暴露我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付人员外流和丢小孩的态度和立场，这是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和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我应向他们道歉认错，我应向他们学习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2:20

3、我对饿死人的态度，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的，也是对全区人民严重的犯罪行为。信阳地区死人我知道的早，情况也知道的多，我对人民生命关天的大问题不仅不采取断然措施，抢救人民生命，而且抱着无动于衷态度，只是以事论事，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有提交原地常委讨论，又不请示报告省委，实质上是隐瞒省委的严重行为。在对待死人问题的态度上，我检讨如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王秉林、阎凤西二同志到地委汇报食堂停伙、外流和死人问题，这时我才头一次知道死人，当时认为问题不小，提出三条办法：一是给粮，食堂一律开伙；二是组织力量突击治病；三是正视死人

问题，处理通报，这三个办法我与杨玉璞、雷玉俭同志商量同意后，跟路宪文商量，路不同意处理通报，还说：应接受开封教训，死人是坏事，应抓九个指头，不要抓一个指头，不要泼冷水，应从正面抓等。我怕泼冷水，怕犯右倾，当时同意了路的意见，没有坚持到底，不了了之，我这种对人民生命关天的大事情，而抱着怕泼冷水，怕犯右倾的严重个人主义错误是不能容许的。是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道德品质是不相容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接到潢川双柳方仁木给我一封揭发死亡二千余人的信，我阅后，叫雷玉俭同志派工作组去检查，并叫检查同志不要转原信，不要追查谁写的主要检查情况是否属实，问题解决没有等。检查期间，县委梁德柱拒绝检查，批评检查组不应去检查死人问题，我叫雷玉俭批判梁的态度，检查后情况完全属实，地委已拨粮食，县委派人员正突击治病，认为问题已解决了，当时，只提出潢川县委检查处理，梁抗拒不检查，路宪文支持他，检查报告一直没写，盖子没揭开，方仁木受到打击陷害。我在双柳群众来信揭发死人问题上，错误是严重的，揭发死人正是全区死人严重的时候，如果交原地委讨论，把问题报告省委，信阳地区死人问题，程度是可以大大减轻的，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把群众来信当成儿戏，不坚持党的原则，怕得罪了路宪文，怕影响团结，不支持好人好事，不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把双柳死人这么大的问题不了了之，我这种态度还不如方仁木同志关心群众生命，挺身而出揭发死人问题，为人民生活呼吁，而我则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严重行为，这和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是不相容的。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南湾和出山店水库工地死人问题，那时认为是因疾病而死，没考虑到是饿死的，那时只强调解决口粮，口粮包干，管好生活，突击扑灭疫情，要求不死人，对已死人的单位只作了批评，没有采取工程停工或减少土方，对已死人的单位严肃检查处理，保证不死人等根本措施，相反的还大叫大干水利工程，开展土方翻一番运动，这不但是无动于衷，而且也是对人民生命落井下石的态度。

一九六〇年元月底，光山白雀公社给地委一封匿名信，揭发该社生活安排不好，干部说假话，并批评路宪文对农村形势，粮食多得很，食堂停伙是富裕中农进攻等分析，当时我向路宪文提出派检查组去检查，路当时还不同意，之后经商量路也同意了，我交雷玉俭同志去派员检查，没直接当面交代，也没有过问检查的情况，说了就不了了之，直到一九六〇年七月鸡公山会议时才知道原检举人受到打击陷害，我这样对人民生命不负责任，对好人好事不支持，已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信阳市付市长汇报金平小铁路工地民工生活问题，南湾灌渠工地赵子荣汇报工地民工疾病和死人问题，一九六〇年元月分省委工作组刘处长汇报鸡公山公社群众疾病外流问题。信阳县余伴勤同志汇报群众疾病问题。一九六〇年二月地委统战部周春茂同志汇报正阳同中公社死人问题等。我只采取了拨粮食，抓治病等措施，也就是以事论事的作法，还认为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没有采取根本性的断然措施，以有效的制止死人，更严重的是有的连具体措施也没采取，地委办公室刘永泰同志汇报遂平嵯峨山公社一个大队生活安排不好和死人问题，地委工作组李傑同志汇报信阳谭河公社一个大队生活安排不好和死人问题，这些我是知道的，地委把粮食已发了，当前农村主要工作是抓生活，没采取具体措施，这是对人民死亡无动于衷的表现。特别是一九六〇年元月底，专公安处把一九五九年年终死亡二十三万人的报告表送给我，我阅后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对淮滨、潢川、商城等县死亡严重的县，向县委第一书记打个电话，看县委知道否？研究没有？向地委写出检查报告；二是死亡人数应分季度，可以看出是什么时候死的；三是抓紧抓好，以便地委向省委作报告。第二天

路宪文从乡下回来，我将公安处的报表和三点处理意见向路作了汇报，路表示同意三条意见，我还不放心，当日下午通知韩仁秉到地委，我向韩说：死人问题路同意你们抓紧抓好，写个材料，地委好给省委报告，我对这个人口死亡统计报告表应负的责任和主要错误：一是认为路宪文、张树藩都知道，我没向原地委常委汇报和提出措施，这是我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隐瞒严重行为；二是没批准及时上报和报告省委，使省委早知道信阳的死人问题，避免严重死人事件的发生；三是公安处报告表不但拖延了一个多月，死亡数字由二十三万，减少到十九万多人，比原报数少了四万多人，直到一九六〇年原地委常委向省委作了一次死人报告时，是按县委七万数字报告，没按公安处年终死亡十九万人报，我虽向路宪文提出过这个死亡数字和公安处数字不符，路一再解释，死亡不（在）多少，主要是吸取教训，县委数字没减少不算隐瞒，结果我没坚持到底，同意了路的解释，还是按路宪文意见办事，这些都是我与路宪文欺骗省委作了假报告，也是严重违犯了党纪。从上述许多人口死亡的事实看，我对信阳地区死人知道的早，也是知道的最多，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冬正处在死亡关键的时候，我没有挺身而出，采取断然措施，抢救人民的死亡，正当这个时候我怕泼冷水，怕得罪路宪文，怕犯右倾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坚持党的原则，不揭死人的盖子，不支持好人好事，不交原地委常委讨论，不上报省委，甚至对死人无动于衷。我与路宪文意见，虽有分歧，但不坚持原则，丧失立场，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关心人民生命的大问题，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蜕化变质的表现，也是我对信阳地区人民犯罪的具体表现。

4、关于在审批逮扑案件问题上，是对信阳地区广大人民专政和镇压的政策，大扑宰杀和刑事犯罪案，我是积极执行路宪文错误政策的，信阳地区在一九五九年冬是个严重缺粮、断炊停伙危机形势，把广大人民因生活所迫而宰杀耕牛、抢劫等情况，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采取了大扑措施，这些都是对人民实行专政和镇压政策，致人民于死地的严重罪过。特别是我在具体审批案件上，经我批准逮扑大批案件（批扑数清查档案），这些案件都是为生活所迫，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劳动人民，我在审批案件上缺乏对人民严肃负责的态度，没有识别真假，没有区别两类不同的矛盾。而把实际情况当思想问题，把是当非，特别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这是我对人民实行专政。特别是对审批案件上不严肃，曾有两次经我审阅后让承办人员代我签字，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这是我对信阳专区人民严重的残害行为，也是我对信阳人民严重犯罪行为。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2:33

从以上许多错误事实，我在信阳事件上是有重大责任和严重错误的。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〇年春，全区正处于严重混乱危机形势下，尤其是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不但无动于衷，而且积极执行路宪文的错误政策，搞反瞒产，逮扑人，大讲不准外流人，批判对外流人员、丢小孩同情流泪，对死人问题无动于衷，既不采取断然措施，不交原地委常委讨论，又不向省委作正式报告，对群众检举揭发坏人不支持，这些错误思想和言行是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人民，这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这也是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这也违背党、违背阶级、违背人民利益的严重行为。我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信阳事件给党、给人民、给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是极大的，严重地葬送了大批人民的生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严重地破坏了三面红旗、破坏了工农联盟和党与群众的关系。

系，葬送了大批干部，特别是县、社领导骨干。给阶级敌人的破坏运动以可乘之机，这些恶果和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这一血的教训是十分痛心的，是我一生难忘的。

我不仅在信阳事件有许多重大弄错误，而在几年来工作中所犯的错误的也是严重的，主要错误是：

(1) 关于对胡友录同志的批判问题，胡友录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受到了批判，他是全区批判最早的一个同志，批判他是我亲自主持的，对他是批判错了，我应负主要责任，在批判胡友录同志的问题上，我应深刻检讨和向他道歉：1、胡友录同志是一个能坚持真理，说实话，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在批判时我对中央反右倾政策领会，是非界限没划清，把他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当右倾思想批判，把是当非了，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打击好人好事，实质上也是纵容弄虚作假的错误。2、批判胡友录同志的方法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我在地专直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反右倾动员报告批判胡友录同志右倾时，把展览红芋、黄豆等农作物标本拿到大会场去，叫他看看抗旱能不能保丰收，我还批判胡友录同志说：把大红芋、黄豆等高产作物当反胡友录同志的机枪，当反右倾的子弹等，我这种思想言行和方法都是错误的，把典型高产当作普遍高产，把解决右倾思想当作敌我矛盾去对待。严重的混淆是非，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对待的不同方法，严重的歪曲中央和省委反右倾方针政策和方法。

对上蔡监委付谨信同志的批判我应负主要责任。一九五九年八月间，他向地监委邱进敏同志反映上蔡一个食堂停伙外流、吃青等问题，地监委交我阅完，我认为有思想问题转县委孙建三同志查一查，于十月分反右倾时付受批判，这是我把反映真实情况当思想问题对待，这是打击好人好事的严重行为。

(2) 在执行党的纪律方面的检查。几年来，信阳地区在执行党的纪律上是松弛的，特别是对坏人坏事斗争上存在着严重地姑息养奸的现象。例如一九五九年春季整社中揭发出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七百余起，当地常委已作严肃处理的决定和方案，因路宪文怕泼冷水，当典型等抵触情绪事后，我没坚持原则，有始无终，最后不了了之，这是我对坏人坏事姑息养奸的表现，由于对坏人坏事姑息养奸，所以在信阳事件中揭发成千上万活活打死人，活活打残废人等凄惨景况，这一祸根是与一九五九年春整社中对坏人坏事姑息养奸有直接关系的。那时我是分工抓群团战线，又兼监委书记，因而对此我应负主要责任，最近几年来，党的纪律为什么松弛，对坏人坏事为什么姑息养奸呢？一是我对待坏人坏事斗争没有认识到是阶级斗争，也没有认识到这一斗争的长期性；二是大跃进以来，干部干劲很大，对坏人坏事处理多了、重了，怕打击情绪，怕泼冷水，没有认识到严肃处理坏人坏事和鼓干劲是一致的。由于我在认识上有模糊观点，因此对坏人坏事斗争不坚决、不严肃，甚至姑息养奸，这也是助长坏人坏事的滋长残害人民的犯罪行为。

(3) 关于浮夸风错误问题，信阳地区浮夸错误已发展到严重程度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恶果。信阳地区浮夸严重是与我带头浮夸分不开的，我的浮夸错误的主要事实：1、不顾客观事实，自己是主观臆断，盲目主张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例如一九五八年提出“三年实现粮食年产量千斤专”的口号。一九五九年秋季粮食生产指标五十亿斤，再遭遇到夏季特大的干旱，指标不但不减少，反而又提出增产一成半，秋季估产六十四亿斤，征购十亿多斤。大牲畜发展：一九五九年终一百一十八万头，一九六〇年要求发展到一百三十万头。鸡鸭一九五九年底两千四百万只，一九六〇年要求发展到八千万只。生猪一九五九年三百个大队发展到一亩地一头猪，一九六〇年要求发展到全区一亩地一头猪。工业产值，一九六〇年要求提高到十亿元。一九六〇年开展全民办电要求国庆节实现电气化。淮河航运要求

在一九六〇年第二季度开展双千万吨公里运动。这些计划指标和任务要求，都是在原地委常委会议上我积极同意或由我提出后通过的。这些都是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都是严重的浮夸表现，也是弄虚作假的表现。2、对高产优质不加分析，盲目的信以为真，大张旗鼓地叫好，表扬和推广，对真正说老实话的同志施加压力，并加以批评或戴上右倾帽子。例如一九五九年初冬专召开的发展六畜、工业、抗旱等先进生产者，积极分子表模大会上，表扬了十七个公社为粮食高产红旗社，三百个大队实现一亩地一头猪，上蔡一头母猪一窝生三十个猪娃，确山新安店石子厂一炮炸石方完成全年任务的红旗手，淮河航运实现千吨公里等，这些单位和个人都受到了表扬，称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单位。但这些成绩和经验，事后发现有不真实的，由半真半假的，甚至全假的。我对这些虚报成绩，骗取荣誉知道了，也不了了之。并没有追查处理，而对检查说老实话，实事求是完不成任务的好同志当右倾批评，打击了好人好事，助长了弄虚作假的发展，严重混淆了是非界限。3、向省委作假报告，例如一九五九年生猪发展情况。全区社办工业计划、产值完成的情况。一九六〇年淮河航运实现千万吨公里情况等报告，这些报告经原地委办公室起草，经我签发报省委的。我对这些重大报告没有严肃审查区别对待，就草率签发了，事后发现有问题的、又没纠正和检查，这是我弄虚作假，欺骗省委的严重行为，也是违反党纪的严重行为。

（4）关于工作作风上的错误，在我的工作作风上错误也是极其严重的，突出的，尤其最近几年来，由于个人无产阶级立场没有能树立，在反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和侵蚀下，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危险情绪严重滋长着，我工作作风上的主要错误，首先是不深入、不艰苦，贪图享乐思想的滋长，我长期不下乡，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特大干旱时期，又没下乡（从一九五九年七月至一九六〇年二月）蹲在机关，依靠汇报、电话办事，严重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即使下乡也是走马观花，只是到县、社一级看一看，听一听汇报，而没有深入到一个队、一个食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中与群众见面，住在县社机关多，三同少；到先进地区多，到灾区和落后地区少；写报告动嘴多，亲自动手少，在生活上在县吃饭多，在群众食堂吃饭少，这种不深入、不艰苦，贪图享乐的作风是严重的。是和中央、省委三令五申要求领导同志多深入下层与群众三同指示精神相违背的。特别是我的作风粗暴，对待同志们不是同志式的平等，谦逊，和气对人的态度，尤其是我一贯喜爱大会批评，指名指事，乱戴帽子，不讲场合和方式，批评人不留余地，话说的过早过死，甚至一个问题反复批评，有些问题小题大作，有些问题是混淆是非，冤枉好人好事，这些错误实例是很多的。例如一九五八年在直干大会上指名批评张凤德同志不听省委史书记的报告，给他戴自高自大，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这种批评是过火的，不利于团结的。一九五九年在批判反右倾大会上批评专气象站长韩芳兰的暮气，实际上是因起床晚了，没有分析原因而加以批评。一九五九年八月我在地专直干大会上传达中央和省委反右倾鼓干劲精神时，批评专计委，对秋季估产过低，我不分析原因没有划清实际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而武断地批评是思想右倾。这是冤枉了好人好事，这种批评是严重错误的。一九五九年夏季全区正处于抗旱紧要关头，专科委王效羽同志在上蔡请示全区现场会推广提水工具经验，当时不同（意）开是对的，王不通：不分析动机是好的，当王一再请示要开，我不耐烦听，不但没解释清楚，而且批评其不听话，这种批评不是鼓气而是泄气，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批评。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我在公路运输公司职工大会对完不成万吨公里，不分析原因，而武断地批评是思想问题，指责某些队有右倾，提出整顿思想，这些批评和要求都是错误的。一九五九年秋地委组织部对提拔常宪清为地委办公室付主任，因群众有意见没宣布是对的，我不分析原因和情况，批判其积压原地常委决定，这种乱戴帽子是极其有害的。一九六〇年第二季度，我在地专直干大会上动员支援钢铁时，批评专林业、机电、工程局对平桥钢铁厂支援不积极，有思想问题等一大堆帽子，特别是对林业局多次在大会上批评，指责他们本位主义，不听地委决定和指示。

这种批评是不应该的，也是蛮不讲理的，有害团结。从以上许多事实看，我在批评方式上是过分的，不分场合的，在批评内容上是粗暴的，蛮不讲理的，甚至混淆了是非，打击了好人好事，我这种批评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而且是严重的有害于干部团结的，有害于积极性的发挥，有害于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害于民主生活正常开展，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因而许多同志对我敬而远之，堵塞了言路，混淆了是非，这也给党造成了极大危害，我对所有被我批评错了的或过火的同志道歉。

（5）在实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上也有问题。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在这一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上被我完全破坏了。首先，我对于群众，以及下级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处于不正常，紧张状态的。严重的不尊重群众和下级干部的权利，不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对许多重大问题，不与地常委、部委、党组商量，就草率从事。对地常委、部委、党组同志的意见不加分析，对于不属于正确的接受、采纳很不够。属于不正确的或者完全错误的不但等人家话说完，就不耐烦听下去于（应为予——编者）以顶回去或者批判一顿，或者戴个有思想问题的帽子就了事。这些都是对他们民主权利不尊重。由于我在骄傲自满情绪的支配下，我没有受到群众监督。许多同志对我的错误，特别是工作作风上的错误的批判，接受不自觉，不诚恳，甚至满不在乎，不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我的错误由一般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这就是我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监督，破坏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民主生活，伤害了群众积极性。在对中央和省委的态度上，不是无条件的执行上级党的指示，而是强调信阳地区特殊情况为借口，打折扣，讲价钱，或者拒不执行。对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省委。例如一九六〇年地方动用木材过多，影响上调任务的完成。一九五九年右派摘帽子没有请示省委批准，而擅自摘掉一批右派帽子。一九六〇年春省委调驻马店火车头没有执行。对中央、省委关于坚决纠正共产风错误不但没执行，反而变本加厉，使共产风越刮越大越严重，并派人员到外地搞协作，不请示报告省委批准。这些重大问题，我是有重大责任的。这都是违犯党纪的，不能容许的严重的分散主义行为，是和共产主义精神绝对不相容的。它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集中统一，实际上来着破坏与扰乱作用的。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原则上，犯有严重的个人包办代替，个人决定重大问题，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个人决定问题。在原地委常委会议上，特别是我主持会议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会前不通知准备，会中不善于气氛诱导，致使委员不能畅所欲言，属于证券意见采纳很不够，属于不正确的，不能等人话说完就解释或者硬性的碰回去。这样一来，对一些重大问题，虽经讨论也是流于形式，委员会等于虚设。在分工负责上，我不放手，有些问题，非个人说了才算，有时一天安排两三个会，非个人参加不解决问题，致使别的委员没啥干，个人忙个不休。有些重大问题我和路宪文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有些是不一致的，有些明知是不对的也不敢坚持争论，主要是怕得罪第一书记，怕影响团结。由于这些错误的支配下，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不坚持或不能坚持斗争到底，这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严重的违犯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精神，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严重影响大家积极性和独立负责的主动精神和对全局的关心，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6）关于写文章上的错误。我在写文章上是有严重错误的，从一九五八年秋到一九六〇年春我共写了十三篇文章，其中有七篇是我开现场会、专叶（应为业——编者）会或动员报告材料由别的同志将讲稿正（应为整，下同——编者）理后我提出修改发出的（一篇是，是我个人动手正理的），三篇是小型座谈会议上讲的材料别人正理的。三篇是出题目（根据我报告底稿）由别同志写的。我在写文章上的主要错误是，个人亲自动手少，动嘴多，内容浮夸严重，脱离实际，影响了党报的严肃性，更严重的是四百元稿费全部归己，这是极端错误的。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大陆直连本站: <http://tiny.cc/meyarw>)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3:14

三、我的错误的主要根源和应吸取的教训。

几年来我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容许的,特别是在信阳事件中我犯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恶果和损失,我所以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我家庭是一个中农成分,个人是学生出身,入伍后,虽经党的长期教育,由于个人主观,努力差,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树立,参加革命后一帆风顺,总认为个人进步快,没有错误,历次各种整风运动都是整年别人,没有整自己,在群众中虽对个人提出一些批评,个人还不虚心接受,满不在乎,这样以来,欠下了一笔政治账,在“信阳事件”中我犯的错误,就有力的证明欠政治账。一生总是要还的,老账不还,新错必犯,这是我犯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和平环境里过日子,忽视政治原则性,在反动资产阶级严重影响和侵蚀下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背上了信阳地区公社、办钢铁、粮食三大包袱,骄傲自满情绪严重的滋长起来,一直发展到信阳地区广大人民正处于严重死亡关头害怕泼冷水,犯右倾不敢坚持原则,竟把这个(应加人——编者)命关天的大事既不提交原地委常务讨论,又不报告省委,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占上风,这是忘了本,忘了党,忘了人民,者完全是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道德品质,这完全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完全是站到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我已完全走上了损害党、损害阶级、损害人民、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道路,我深刻地体会到资产阶级个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骄傲必败,骄傲就是罪恶,政治账欠不得;对党必须忠诚老实,这些都是我犯错误的规律和根源。信阳事件与我个人主义严重滋长分不开的,“信阳事件”的恶果就我的个人主义滋长的恶果,我在政治上欠下了党的帐,欠下了全区人民的帐,欠下了使我一生难以还清的帐。

“信阳事件”是严重的,我的错误是严重的,血的教训是深刻的,必须虚心学习,戒骄戒躁,树立和坚定为人民服务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坚决从实际情况出发,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如实的反映实际情况,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党性锻炼。

我的责任重大,错误严重,党应对我严肃处理,只有如此才能挽回党的政治影响,才能平民愤,也才能有利于我接受教训,改造自己,我保证愉快的接受党给我的处分,分配给我最低的工作,我保证积极工作,团结同志,向全党全区人民作长期的检讨认错,我完全有信心在我的后半生,在今后实际工作中吸取教训,考验自己,重新作(应为做——编者)人,改造自己。来弥补“信阳事件”的损失,因“信阳事件”严重和我的错误重大,尤其是我对个人错误认识不够之处请省委、地委指示,我决心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继续提高认识,真正吸取教训,把坏事变好事,我决心在我的后半生,用最大努力做到小错误不犯,大错误避免。

王达夫

在一九六二年检讨的基础上于一九六三年元月五日重新修正的

作者:京客 日期:2011-04-24 23:15

毛、刘与河南省委领导人